

99/17

总第88期

炎黄春秋

■ 曾克林率部挺进东北亲历记

■ 我与东史郎深谈南京大屠杀

■ 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

■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 拜望舅公张学良

■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

■ 我在加拿大打官司



王秦给太舅公张学良祝寿



国人当自强

以史为鉴

炎黄春秋

春秋笔

- 2 曾克林率部挺进东北亲历记 易俭如
 10 我与东史郎深谈“南京大屠杀” 张帆
 15 听我父亲苏静谈北平和谈 苏晓林
 18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 邓加荣

赤子心

- 23 拜望舅公张学良 王秦
 28 东北易帜始末 于耀光

沉思录

- 34 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 冯建辉

求实篇

- 41 一篇《迎春花》厄运二十年 殷毅
 47 王造时“反苏”真相 周英才
 49 澄清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考证上的迷乱
 周明沈达等

殒星篇

- 52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朱鸿召

人海浪

- 57 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世界 陈扬桂
 60 我在黎巴嫩的“死亡之旅” 李同成
 66 无怨无悔的世纪老人周骏鸣 王晓蕾
 68 聂绀弩在北大荒 赵国春

两岸情

- 70 欧阳予倩在台北演话剧 吴克泰

飞来鸿

- 73 我在加拿大打官司 赵金城

古今谈

- 76 康有为与刘海粟 钱听涛
 78 明清官吏的“合法伤害权” 吴思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庄 李普
 李学勤 吴象 苏双碧
 张锲 张国琦 凌云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青 戴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宋文茂(常务) 徐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吴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 4.80元

曾克林率部 挺进东北亲历记

● 易俭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确定“向南发展”还是“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时，曾一度举棋不定。当年第一个率八路军挺进东北的曾克林将军，率部深入东北腹地，并与苏军代表一同飞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党中央政治局集体听取曾克林的汇报后，连夜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迅速调兵遣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独霸东北的企图，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由此展开一场大决战。现已 86 岁高龄的前海军顾问曾克林将军对笔者介绍了当时情况，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攻克“天下第一关” 八路军和苏军并肩作战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日军和伪满 3000 里防线进入我国东北，红军坦克和空降兵部队分别在东北中部平原、长春、大连、哈尔滨等地与日伪军激战。

8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配合盟军作战，举行全国规模大反攻。接着，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一、二号命令，令抗日部队按照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坚决消灭之。

时任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

林和政委唐凯，决定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率部挺进东北，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进军东北，必须首先攻克沟通关内外的门户——山海关。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但驻守山海关六百余日军，千余伪军及数千名警察、宪兵、特务，凭借武器精良，负隅顽抗。

曾克林率部首先消灭了山海关周围的守敌，8 月 20 日又与一上校率领的七十余人的苏联红军队伍会师，并截断了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交通，使山海关成为一座孤城。

曾克林同苏联红军上校研究后决定，“先礼后兵”，向城内日伪军送交了“通牒”，令其投降。但日军军官却借口奉上级命令要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而拒绝向八路军和苏军缴械。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以武力解决山海关的问题。

八路军和苏军从东、北、南三面将山海关包围起来，总攻击令一下，苏联红军首先向敌人开炮，八路军集中轻重机枪、迫击炮，封锁“天下第一关”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

战士们借着硝烟，冒着弹雨，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冲过护城河，架起软梯，向城头奋勇攀登。指战员边攀登边顺着垛口猛投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登上城头的我军战士挥起大刀，端起刺刀向敌人杀去。嚣张一时的日伪军，顿时一片混乱，四散逃命。与此同时，苏军用战防炮轰开了东城门，两军战士猛虎般扑向城内，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亡命而逃。

这次战斗共击毙和俘虏日军二百余人，毙伤和俘虏伪军一千五百余人，收缴长短枪三千余支，掷弹筒、迫击炮五十多门，轻重机枪七十多挺。

长期以来遭受日伪军压迫的山海关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1945年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版用大字标题报道：军事要冲山海关为我军光复。

八路军进军沈阳 触及美苏蒋的矛盾与默契

9月3日，曾克林率部乘火车，浩浩荡荡向锦州、沈阳疾进。

抵达锦州时，他们与先期到达的苏军沟通了情况，曾克林提出要留一部分部队接管锦州，苏军表示同意。他们一路前进，一路接收，沿途共接收了十三个县两个市。

9月5日晨，满载着部队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进入沈阳市郊。高耸入云的烟囱映入指战员的眼帘，车厢内欢呼雀跃，大家都为能马上接管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激动不已。

沈阳，是苏军于1945年8月21日解放的。当曾克林率领的这支八路军部队进入沈阳时，苏军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事先也没有联系。他们看到这支部队没有军衔，来得又这么迅速，非常怀疑，连忙调集部队把火车站包围起来，不准我军下车。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军不认八路军？

后来，他们才知道其中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早在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的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就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德国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美、英两国同意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日本将其从帝俄手中夺取的库页岛归还苏联；千岛群岛划为苏联领土；将大连港国际化，将旅顺港作为苏联的军事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管。

同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解放东北后，要



1945年8月30日
曾克林(右三)和苏
联军官共同研究攻
打山海关的战斗计
划

把东北政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这就使抗战胜利后，谁能接管东北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

曾克林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同情与支持的，苏联出兵，促使日本投降，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但是，苏联政府对美蒋力量估计过高，只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答应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东北，又为我军进军东北带来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早在8月29日就向有关解放区发出内部电报，指出：“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三省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据此，中央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动，以东北地方军及义勇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开始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能驻扎的中小城市。同时还要求我军：“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亦不请红军给我们以帮助。如果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们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战线上为难。”

曾克林说，当时由于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中央这份重要的内部电报我们未能收到。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从我们面临的情况出发，处理问题。我们这几千人马已孤军深入东北腹地400公里，是进还是退？如果退避三舍，就只能坐等蒋军来接管，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为此，曾克林和几位领导同志在车上迅速作了研究，决定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又称“城防司令部”）交涉。

苏军沈阳卫戍区司令卡夫通少将见到曾克林等人时，傲慢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的。”

卡夫通又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

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第一次交涉未成，回到火车上，曾克林和唐凯政委等商量后认为，虽然有了一个中苏条约，但八路军也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应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朱总司令的二号命令。我们决定和苏军力争。

第二次，曾克林又找到卡夫通进行交涉。向他讲了上述意思，但卡夫通坚持不让我军下车。这时曾克林态度也强硬起来，向卡夫通提出了抗议。但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仍坚持己见。

我们的部队已在车上停留一天了，吃饭喝水成问题，连上厕所也困难。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曾克林通过苏联翻译耐心地对卡夫通做工作，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在山海关已经与红军共同作战了，又在锦州与红军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红军不让我们来让谁来？唐凯还伸出手，让卡夫通看自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比划着连声说：“毛泽东！斯大林！”“共产党，毛泽东！”

卡夫通最后总算同意我们部队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公里外的苏家屯去。

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僵局已经打破了。曾克林向部队发出了下车命令。临近傍晚，近两千人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肩扛钢枪，威武雄壮。曾克林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前面。

八路军抵达沈阳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全城。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潮水般涌向车站、街头。当我军以苏军两辆装甲车为前导，成四路纵队由西向东行进时，沿街两旁有三四万群众挥动旗子，向八路军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

卡夫通得知老百姓自发欢迎八路军的盛况，非常震惊。随即改变了怀疑态度，派两名上校，乘吉普车在中途拦住我部队，恳切地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

河沿。”这支英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小河沿行进。群众夹道欢迎，一直送到驻地。第二天，苏军又让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9月7日，苏军两个上校来到司令部，对曾克林和唐凯同志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电报了，你们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

苏军驻沈阳部队，是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苏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还有各兵种军长等。他们与曾克林和唐凯见了面，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苏方举行的宴会上，苏方代表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曾克林告诉苏军将领：“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冀热辽是我们坚持战斗的地方。第一个配合你们作战，打开山海关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正因为我们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蒋介石消极抗战，他的军队还在大后方呢！”

苏军听了这些解释，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接着，双方进行了研究，苏军提出，为避免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生抵触，建议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对外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在外交上苏联就可以争取主动。曾克林和唐凯采纳了苏军的意见。

曾克林所部取下八部军臂章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活动方便多了，与苏军的合作十分默契。

那时的沈阳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伪满的反动官员及统治机构，或完全保存下来，或改头换面，成了各级“维持会”的大小头目。国民党特务乘机充当接收人员，到处网罗敌伪残余人员，组织国民党“先遣军”。沈阳伪警备司令部门前，公然挂起了“中国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招牌，门前站着荷枪实弹的伪军。当时，仅沈阳的国民党地下军就号称有40个团，他们整天打枪开炮，

破坏治安，甚至打死我军战士。

为迅速扭转混乱局面，有效地进行接管工作，曾克林、唐凯和苏军协商，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相对应，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卫戍区司令部成立后，立即解除敌伪武装，收缴敌伪武器，两三天内，就把沈阳市一万五千多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的武装全部解除，伪满洲国兵旅五千多人也全部缴械。

在有地方各界名流参加的会议上，曾克林宣布我军正式接管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在新政府人选上，为了各方面都能接受，从沈阳民间选出一位医生（民主人士）白希清当市长。9月15日，我方派出的代表焦若愚到达沈阳后，任副市长，实际主持工作。

接着，以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名义，向沈阳市和我军所到之处张贴安民告示，宣传我军宗旨，号召市民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我军消灭敌伪残余，保护厂矿，恢复生产，维持社会秩序。同时，抽调干部，分头到全市各行业开展工作。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厉镇压。这样，才使局面初步稳定下来。

八路军和苏军代表飞赴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星夜运筹

曾克林回忆道：当我冀热辽部队进入沈阳后，路透社、合众社、法新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纷纷发出消息，指责苏联政府允许中共部队进入沈阳，违背了波茨坦三国联合公告。我沈阳卫戍司令部成立后，苏军曾一度把军火仓库交给我军看守。我军打开仓库，拿出一批武器。美国得到消息，又向苏联提出交涉。

曾克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西方国家都大大削弱了，唯有美国损失较小，地位反而提高了。它妄图称霸世界，在远东和亚洲地区则想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这种态势下，东北成了当时影响国际局势的敏感地带。我

军进入东北，美英等国必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对苏施加压力。

但是，挺进东北，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八路军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抗日军队。八年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直在敌后广大地区坚持最顽强的对日作战，此刻接收日寇投降无可非议，而三国首脑会议及中苏条约把我军排斥于接收日寇投降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

为了表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决心，在首批部队出关后不久，又委派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三个团五千人，于9月6日进驻山海关。为了扩大影响，事先通知了驻山海关苏军，苏军派汽车出城迎接，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随后，李运昌率领“前指”和一个团继续沿北宁路前进，于9月14日进驻沈阳。

在此之前，苏军驻沈负责人迫于美英等国的压力和一些新闻传媒的攻击，曾告诉曾克林和唐凯，根据中苏条约，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希望曾、唐带领部队离开沈阳。曾克林和唐凯明确表示：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的，只有中共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是不行的。苏军驻沈负责人没有办法，就向驻长春苏军最高司令马利诺夫斯基、远东前线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作了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曾克林通过电报向李运昌请示并得到他同意，决定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这时，苏军也急于找中共中央进行联系。因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一架飞机去延安，并派卫斯别夫上校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及一位中校翻译与曾克林一同前往。

9月14日，飞机由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的多伦着陆加油。第二天上午，飞机越过崇山峻岭，飞临延安上空。曾克林从机窗口鸟瞰延安，心中无比激动。他离别党中央所在地已整整八年，现在又投入她的怀抱，犹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杨尚

昆、伍修权亲自到机场迎接。汽车把曾克林和两名苏军代表送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

曾克林回顾了党中央当时针对东北的形势，已连续发出的几份电报：

1945年8月11日，党中央电告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党组织：“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马上开往东四省。”（编者按：这里称东北四省，即除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外，加热河一省）

8月2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没问题。”

8月29日，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地方军和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

9月10日，中共中央命令山东八路军四个师立即向东北出发，原东北军万毅部及冀中、晋冀鲁豫各一个团向东北行动，太行周桓率一个团及大批干部向东北出发。晋察冀准备派2500名干部去东北，并命令李运昌准备派五个团接替山海关至沈阳的防务。

曾克林说：上述情况说明，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将原来决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但是，要实行“向北发展”，必然牵动全国各解放区的总体战略转移，牵动整个战争全局。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党中央必须进一步弄清东北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正好由苏军代表和他一起来到延安，从一定意义上说，曾克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为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党中央对他和苏军代表的到来十分重视。

9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

会议。彭真把曾克林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场。当年在长征路上，曾克林多次聆听过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现今见到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接着，刘少奇主持会议。他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了，暂时很难有结果。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消灭汉奸，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国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曾克林同志谈谈东北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会上，曾克林汇报了带领部队进军东北，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他介绍说，由于日本统治14年，东北人民的苦难十分深重，我军到达东北后，群众纷纷参军参战，对敌斗争情绪高涨，扩军很容易，现我部已发展到两万余人。我们已接管了许多重要工厂及仓库，内有大批枪炮、弹药、军需物资、粮食。他还汇报说，苏军只驻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配合苏军，消灭敌伪势力，接管东北。

刘少奇及党中央其它领导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刘少奇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他顿了一下，接着又说：“这里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14年前出卖了东北，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它又来抢占东北，夺取胜利果实。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

力争接收这个战略地区。”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以刘少奇名义给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发了电报，电文说：“今天下午，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索中校（应为卫斯别夫上校）乘飞机由沈阳到此，并由我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现任沈阳卫戍司令）同来。贝中校明飞回沈阳，今天拟与贝中校正式谈话。”

据了解，同卫斯别夫正式谈话的是朱总司令和伍修权同志。卫斯别夫在谈话中曾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条件。如“按照红军统帅部的指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并要求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命令已进入满洲、热河的八路军“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由于我军的力争，卫斯别夫与朱总司令最终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为伪满洲国一个省，辖辽西14个县）。

随后，苏军代表还正式表明态度说：“红军统帅部正式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在曾克林汇报结束的当天，党中央立即给各中央局发出了通报，并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当晚，曾克林和刘少奇等中央首长一起吃饭。席间，彭德怀副总司令对他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多搞点武器和大炮。”

夜晚，杨家岭的窑洞里，灯光彻夜通明。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最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刘少奇强调：“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并指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为了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党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先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名干部到东北；党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彭真、陈云、伍修权等，立即乘飞机到东北工作，并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党中央调兵遣将 三分之一中央委员云集东北

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六人乘飞机离开延安。

行前，党中央考虑到苏方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

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可以说，他们是我军历史上最早被授予军衔的人。

当天下午，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由于天气不好，苏军驾驶员麻痹大意，飞机着陆时冲出跑道，机身受到损坏，叶季壮头部被碰破了，受了重伤，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及曾克林都受了轻伤。彭真被撞成脑振荡。陈云在飞机舱门被撞开时，把他摔进了驾驶室，幸而没有受伤。

9月17日，彭真、陈云等一行乘火车北上，第二天到达沈阳。喜讯传来，冀热辽出关部队指战员为之振奋，欣喜若狂。干部、战士们聚集在原沈阳市府大楼，欢迎中央首长。陈云亲切地在欢迎会上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搞得很好，你们执行中央命令坚决勇敢，先机占领了东北，这对中国革命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央向你们表示慰问！”掌声响过之后，陈云对东北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作了指示。

当天，彭真、陈云同志给延安发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已安抵目的地。从此，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曾克林（中）和随后到达东北的肖华（右一）等领导同志合影

彭真、陈云到达沈阳后，原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周保中，两次向他们汇报工作。彭真、陈云对东北抗联坚持14年抗日斗争的业绩给予了很高评价。

9月19日，东北局在沈阳“大帅府”西楼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彭真、陈云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段子俊、曾克林、唐凯、朱其文、段苏权、刘达等二十多位领导同志参加。

会上，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心和方针，指出，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力争控制满洲（东北），因此，东北局的任务就是要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沿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重要海、陆交通要道，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的到来。针对国民党妄图内应外合，独霸东北的局势，彭真、陈云讲述了我军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李运昌正式通知苏军：中共中央已派人到沈阳，成立了东北局。苏军立即报告了莫斯科最高统帅部。

在党中央和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正确领导下，冀热辽出关部队斗志昂扬地开始了全面的接管工作和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北至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南到营口、丹东、旅大；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到处是放手发动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

冀热辽军区和党委还以辽宁行署的名义发委任状，派专员、县长和地方干部到各地去接管城市。在沈阳，成立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张学思任辽宁省主席，白坚任省委书记。至9月底，冀热辽出关部队已配合苏军解放了当时的辽宁全省、热河全省和吉林西部、黑龙江省南部地区，先后接管了一大批城市。

不久，党中央派的干部陆续到达东北，并迅速开赴东北各地。林彪一行去山东途中于河南濮阳接到党中央指示后，改道经山海关到达东北，同来的有肖劲光、邓华、李天佑、江华等。

10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进入东北的我军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自治军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陈云、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陆续到达东北工作的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罗荣桓、林枫、陶铸、蔡畅、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刘澜涛、程子华、乌兰夫、万毅、古大存、陈郁、肖劲光、陈正人、罗瑞卿等。其中有4人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总人数占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东北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 林耀）

来函照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1999年第5期上刊登张帆同志所写《告别丁一岚》一文，文笔流畅，内容感人。遗憾的是，其中的“现场直播开国大典”一节所叙述的情况，和事实不合。我做为丁一岚的老战友和“开国大典”实况广播工作的参加者之一，认为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首先，实况广播的全部稿件，都是广播电台编辑部自己组织采访、写作的，我是少数几个执笔者之一。张文中所说：“大部分稿件是新华社记者当场写的。”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也不是这么回事。张文又说“梅益坐在天安门城楼一个角落，一张一张地看稿，适合播音的立即交播音员”，更不是事实，城楼上哪里可能找到一个什么“角落”，让他“坐”下“看稿”呢？

其次，张文中提到，丁、齐二人“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播音台前”，使人以为城楼上专门设了个“播音台”。实际上，只是在城楼西侧的平地上树立了一个话筒，我们四个人（梅、丁、齐和我）一同在那里工作，而不允许设任何的“台”，以保持城楼的本来面貌。

第三，按照通常的广播业务用语，我们都是称为“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因为“广播”的只能是“开国大典”的“实况”（“实际情况”的简略语），而不可能“直播”“开国大典”本身。作者不是从事广播工作的，不太熟悉这方面的业务用语本无可厚非。不过，既然已经公开发表，还是纠正一下为好。

杨兆麟

我与东史郎深谈 “南京大屠杀”

● 张 帆

轰动日本的《东史郎日记》案两次败诉，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及媒体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为此对新闻界发表评论，表示惊讶和遗憾，严正要求日本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香港实业界人士陈君实评论说：“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东史郎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竭力改变日本人的国际形象；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东史郎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他反省了过去的罪行，用真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谅解，用实际行动来构筑真正的中日友好桥梁。”

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是新华社前线记者，1953年到中新社工作。出于职业兴趣，在获悉东史郎访华的消息后，特地在今年4月间从北京赶到南京，去见识一下当年的日本侵华士兵、今天真诚认罪的日本朋友东史郎。

在离京前我已了解到，东史郎在北京短暂逗留期间，观看了《我所认识的鬼子兵》这一描写日本“鬼子”的话剧。他坐在第二排，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在剧院留言簿上用汉字写了观感：“侵略加害者证言”，意思是说，他本人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害的见证人。他因心情痛楚，一时说不出话来，由陪同他访华的山内小夜子代表他向编剧、导演、演员表

示感谢。她说，东史郎认为该剧正确反映了当年日本兵的某种心态，也是日本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没想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日本这么了解，相对而言，日本民众却很少理解中国人的心理，这太遗憾了。

到了南京，我花了两天时间，听了东史郎的两次讲演，并和他进行了一次较深的谈话。

“我就是曾经被中国人民称为‘东洋鬼子’的东史郎，今年正好87岁。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遇难50周年的仪式上，我曾经来到南京，向中国人民谢罪！那次，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曾经对我说，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的耻辱。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的《日记》与《拉贝日记》不同，拉贝在南京救助难民，我却是个加害者，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东史郎这样坦率地介绍自己。

他这次是专程来南京参加《东史郎日记》（中文版）首发式的。他在金陵饭店该书首发式上说：“我的日记是战争加害者的日记，是使中国人民遭受惨痛经历的日记。我真实描述了战场上的情景和真相，我真实地记录了历史。”

他在一本《东史郎日记》扉页上签下“东史郎”三字，交给我留作纪念。

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生，日本京都府

竹野郡丹后町间人。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他的从军档案记载的军职是:步兵、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伍长、军曹。他所在的部队是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8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从上海回国。

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五本约40万字的战时日记。

战后,东史郎回到日本,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家庭生活富裕。1987年,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谢罪,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上,东史郎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每个人都淡忘了,但因为我有这些记录,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极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忌恨和威胁。

东史郎这次到达南京后,南京大学在4月13日下午为他举行了《东史郎日记》案报告会。报告会会场南大礼堂,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为了便于采访,我是由陪同人员从侧面绕到前排的。

南京大学领导宣布开会后,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史学家高兴祖简要地介绍了有关历史和案件情况,接着就是《东史郎日记》作者东史郎讲演。

满头白发的东史郎声音洪亮,腰板直挺。他在主席台上,向到会者深深地鞠躬,明确坦荡地说道:“我是来南大谢罪的!中日战争50

周年之际,我曾专程到南京谢罪。50年前的那一天,我们从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我对不起南京人民。”他说“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时,火车越是接近南京,我的心随之越发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可是当我谢罪时,没有人动我一个手指头,一个女人过来说,不忘过去,展望未来。今后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代友好下去。”

东史郎说,南京大屠杀确是人类20世纪的耻辱。我反省过去的历史,内心十分痛苦。所以,我来谢罪。

他回顾过去侵华战争时的思想说,当时上级教育士兵:“中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服从命令,忠于天皇,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这种帝国主义教育贯彻到每个日本人身上。轻视生命,自己的生命不过是一根草。在这种教育下,我们来到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上级要求我们为了战争的胜利,不顾一切地杀人!我们的任务是勇往直前地打仗!我们到过一个个村庄,上级命令,把中国人杀掉,37名老人、妇女和孩子相继被杀。“这和游戏一样,是为天皇而战。为了自己的安全,就杀所见到的人。”

他说,从12月10日开始,日军连续三天猛攻南京。中国军队撤退不及,全城大乱。12月13日,南京陷落。大屠杀开始。我见到有7000人被分组,全部杀掉。



80岁的张帆(右一)与87岁的前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在南京会晤

其实，东史郎揭露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早已有历史定论。在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和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南京大屠杀”一节中，均根据铁证判定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和俘虏总数达30万人以上。另外当时南京有关部门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也是日军杀害我同胞达30万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据记载，慈善团体共掩埋18.5万余具尸体（其中，崇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红十字收埋4.312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私人共掩埋尸体3.5万余具（其中，湖南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收埋2.873万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收埋7000余具）；伪政权共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中，伪南京市公署督办高寇吾组织收埋遗骨3000余具，伪下关区区长刘连祥组织收埋尸体3240具）。日军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部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入长江中。日军战俘太田寿男，攻陷南京时任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据他供认，曾与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800名士兵、10辆货物汽车和30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太田寿男负责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负责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江尸体有5万具，合计被日军毁尸灭迹的总数为15万具。由以上统计，可以得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

美国张纯如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第八十页也记载了日本人自己在大屠杀第一个月里统计出来的铁证数字。书中说：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给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美国张纯如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第八十页也记载了日本人自己在大屠杀第一个月里统计出来的铁证数字。书中说：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给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东史郎抨击东京法院的不公正判决

自几天前回到上海之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报告。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以及继续采取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译注）的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杀，许多杀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极其残忍的。”

这份日本密电（第1263号）存入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对此是无法抵赖也无法否认的。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的无理判决，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企图否认日军侵华暴行。

日本声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内山小夜子女士和日本著名评论家津田道夫先生在东史郎讲话结束后，立即在南京大学礼堂公开揭露了东京判决的政治实质。内山指出，东史郎东京败诉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判决结果。它（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历史事实作出的判决，完全是右翼势力操纵司法的不公正的判决。这一判决引起了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的问题，它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次日本人民与右翼势力的较量。津田先生也指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被迎入靖国神社，表明了日本右翼思想抬头，出现了新纳粹

主义，因此日本对侵华战争谢罪没有实现。

东史郎亲身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又以日记形式揭露日军罪行，却被东京法院两度判决败诉。他本应是原告、申诉者，却被不公正地判处罚款、道歉，这使东史郎心中充满了悲愤。他不顾年事已高，旅途疲惫，在女儿和日本学者，以及声援会的朋友陪同下，第六次来华，寻求真理，讨回公道，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

在东史郎讲演的南大礼堂门口，我见到展出的万名师生签名的声援东史郎正义行为的十几米长的横幅，其中有位日本留学生也签了名。他说，以前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现在了解了，那完全是一场暴行。讲演结束后，南大同学到台上将万人签名的巨型的横幅，捐赠给东史郎。这时全场气氛热烈，场面十分壮观。从这个场面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民对真心悔罪的侵华士兵是十分宽容和支持的。

据了解，在这之前，东史郎已多次来华真诚谢罪。在谢罪活动中参观中国的纪念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他受到了教育。1997年12月中日战争50周年时，东史郎在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在碑前长跪不起，见到中国人就道歉。1998年3月，东史郎再次到南京时，为了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世人，他将战时日记、当年日本天皇颁发的金鸚勋章和瑞宝章勋章、从军章及其证书、签名军旗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回国后，东史郎特地给纪念馆来信说：“我对大家对我的原谅，表示感谢。”他说，“我来南京谢罪时，留在家里的妻子就接到了外面不少恐吓电话，骂我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而我的妻子是毫不畏惧地支持我的。”

今年四月东史郎再次到南京时，他又访问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了该馆在今年2月4日举办的《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这个展览在展出的两个多月中，接待了中外观众4万多人次，收到声援东史郎的信件逾千封，签名者达2.3万人，遍及全国30多个

省、市、自治区100多个城市。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土耳其、尼泊尔等国和香港特区、台湾地区的观众，也纷纷签名。东史郎由他女儿和辩护律师空野佳弘、日本支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内山小夜子、日本华侨日中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等人陪同，仔细地观看了资料展的各项内容。他说：“这个展览办得好！内容客观翔实，非常有说服力。有这么多中国人声援我，说明尊重历史者将受到尊重。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应该到南京来看看这个展览会，听听中国人民的声音。”

东史郎还说，“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南京人民对我的支持。我对南京人民而言，当年是一个战争的加害者，看了这个展览，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我因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而得到南京人民的有力支援，心里非常激动。”

他看了南京人民为举证捐献的当年南京地图、南京众多的新闻媒体发表的支援他的文章后说：“在东京的法庭上，我败诉了。可是在南京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实际上是胜利者，而东京的法官们是失败者。”

当他看到展出的南京法院门前手榴弹事件的手榴弹时，他提高了声音说：“日本的大法官应当到这里来看看，这就是事实真相，这样他们才不会主观臆断。”他说，“即使我第三次败诉，我也将坚持为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作证，直到死去！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

参观资料展结束后，东史郎说：“我已于（1999年）3月19日正式上诉到东京最高法院，我强烈希望中国人民包括南京人民继续给我支持，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中国人民的声援信，支持我同东京法官们斗争到底。”

据了解，中国人民对东史郎的声援早在东史郎访华前就已经开始了。

江苏省为此在因特网上专门设立了声援东史郎网站，开始了网上声援活动。这一网站是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苏电台多媒体通讯局和江苏东方比特信息服务公司联合开设的。在这个网站上，人们不仅可以详细

地了解《东史郎日记》案，以及有关声援活动的进展情况，还可以直接在网上签名声援。网站的网址为：www.jsinfo.net/nim/DSL。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对我说：该馆已将征集到的声援签名信件和横幅以及物证，移交给了正在南京的东史郎及其律师团。

在南京，我单独会见东史郎并与之深谈，时间是在他向南京青少年官讲述《东史郎日记》案之后，地点在会场后面的一个工作室里。“你在华北子牙河、石家庄作战时，我正在八路军晋察冀边区随军作战。1939年，我的父亲张培植被日军驻保定的桑木师团特务惨杀。”我见到东史郎时这样对他说。他立即起立，我让他坐下。“你几次来华表示谢罪得到了我们的宽大和谅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我随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亲眼看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但也听到了日本右翼势力高音喇叭的反华喧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于心不甘，不承认侵华罪行，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中国人自己搞的。这种不顾事实、掩盖真相的行径，遭到中国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唾弃。”

东史郎频频点点头。他的表情有些痛苦、悔恨，心情有些紧张。

“我是从北京来的，是来支援你的，你的讲演我听了，中国人万人签名支援你的巨型横幅，表示了对你的坚决声援。”我说。

“是是是”。东史郎回答说。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我说：“第一，你的队长桥本光治，为什么在你出版日记后六年不做声，而后来却向法院告你？第二，你必须拿到美国驻日本领事馆的签证才能飞入芝加哥，为什么抵达芝加哥机场后美国却又不准你进入美国？第三，东京法院两次判处你败诉，现在你又向东京最高法院再次申诉，发展情况及其结果，将会如何？”

东史郎对这三个问题，似乎早有思考，他立即回答说，这都是右翼势力作祟。

他说，他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的残暴行径，在我的日记出版后六年，他确实没有提出异议。1993年4月，在一些原日本将校的策划下，桥本才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我和青木书店及该社编辑下里正树，诉讼至东京地方法院，要求登报道歉，支付损害赔偿金200万日元。这是右翼势力企图以此案来否定南京大屠杀。

关于第二个问题，东史郎说，这是右翼势力作了手脚的。

1998年6月29日，由前日军军医、日本律师等组成的日军侵华罪行见证团，在纽约举行侵华罪行报告会。他和条冢良雄也应邀参加，但当他们于28日到达芝加哥机场时，却因是“战犯”而被拒绝入境。他俩人不能参加会议，只好由别人宣读证词。

条冢良雄在证词中说：“从1940年5月开始，我参与繁殖跳蚤的工作，受命在死老鼠身上取出跳蚤，分别储存，后来知道死鼠及跳蚤被运送到南京施放。”他说：“我所属的部队还进行活人解剖实验。”

东史郎在证词中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日本人对原子弹爆炸的祸害非常敏感，但对侵华暴行却只字不提。日军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比原子弹爆炸不知严重多少倍。”

东史郎回答我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时说：“我要征集一亿中国人的签名声援拿到法庭上去。上诉虽然困难重重，但我有继续战斗的信心！”

东史郎说：“桥本光治（原告）形式上是胜诉了，但实际上（道义上）他败了。我在这里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这个战争加害者，我很感动！”他认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审判，真正的法官应当是中国人民。他说，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尽管可能暂时被歪曲，但我坚信“正义必胜”！

我和东史郎的谈话刚刚结束，一群记者挤上来了，其中一个来自北京的报社记者，请东史郎题字。他提笔写了“粉骨精白”四个字，再次表示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

（责任编辑 程度）

听我父亲苏静

谈北平和谈

● 苏晓林

在纪念北京和平解放 50 周年的日子里，我更多地想念父亲。父亲苏静当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进城，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被授权在协议上签了字。

父亲于 1997 年 11 月病逝，现在回忆起父亲当年为北京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联想他生前做的许多事情，更加敬爱他，怀念他。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对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很少提起。每当我听到一些老革命、老红军作报告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总是既崇敬又羡慕。我经常想，父亲也是老红军，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什么他就没有什么革命经历对我们讲呢？

记得 1963 年在我刚上高中时，母亲拿出一件旧毛衣给我穿，并说：“这还是傅作义送给你爸的呢！”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父亲当年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一个人穿上便衣，偷偷进了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至于如何进的北平城，怎么谈判的，就无从知道了。那时候，我隐约感到，在父亲看来，自己无论有什么功绩也是不应该讲的，要讲，就讲毛主席的丰功伟绩。1960 年，为配合毛选第四卷的出版发行，父亲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同志对辽沈战役的杰出指导》，另一篇是以刘亚楼司令员的名义发表的，题为《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后来，父亲被指派领导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工作。从这时起，我才知道父亲是最了解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人。

1983 年后，父亲在电视上看了一部描写北平和平解放的话剧，觉得其内容与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使他内心很不平静。从这时起，出版单位找他约稿，他才开始考虑要将这一段不为人尽知的历史公之于众。

1988 年 4 月，父亲写了一篇题为《回忆北平和平谈判》的文章，并在报上发表。当时父亲已经 78 岁，但他整篇文章自己亲自动笔，不要秘书帮忙。只是让我帮他抄写和打印。每打印一次，他修改一次；再打印，再修改，写了很长时间。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整篇文章看起来太平淡了，就象记流水账一样。这么大的历史事件，要是作家来写，真可以写成一个大部头。”父亲却说：“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还能怎么写？”我说：“你当时总会有些思想活动吧？比如，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应该如何完成。另外，一个人独闯国民党军占领下的北平城，会不会有危险？”父亲却说：“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进城的，我只是跟着傅作义派来谈判的人一起进去就是了。到了德胜门，傅作义还专门派了他的秘书长王克俊去接我。”我说：“当时城里蒋介石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谈的。当时力主和谈的原北



苏静将军摄于1951年

平市市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特务炸了吗？何思源还受了伤。”父亲却说：“不会的，我一进城，傅作义就把我安排在他的联谊处，是日本过去的公使馆，那里驻守了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周围还有便衣巡逻，安全得很。”我说：“北平和平解放，你是立了大功的。”父亲却说：“我只是奉命进城，既然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有没有我都是一样，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还会派其他人进城的。”我说：“难道当时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父亲说：“有哇！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很担心完成不好任务。”

我的意见对父亲好像起了点作用。他又加上这么一段，大意是：临行前，罗荣桓政委把我叫去，对我说，中央决定派一名对党忠诚又能很好掌握政策的同志进城去，我们研究过，认为你最合适，危险嘛，是会有有的，不过没关系，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万一他们真的扣住你也没关系，我们俘虏了他们那么多军长、师长，到时候可以用他们把你换回来。我回答，我并不担心有什么危险，我是担心完成不好组织交给我的任

务。

在最后定稿发表时，不知是什么原因，父亲又把这一段删去了，根据父亲一贯的不愿表露自己的品格作风，我想父亲这样做可能是不愿通过罗荣桓政委的话来褒奖自己吧。

说到对北平和谈的贡献，父亲在文章中已对自己作了评价。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月18日晚，傅作义将军偕同王克俊、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在崔载之陪同下来到联谊处，先是对我表示慰问，然后当着在座的人表示他的态度，说：“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我对傅将军的慰问表示了谢意，并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以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从文章的这一段可以看出，父亲只把自己的历史作用看成是一个联络员。

在父亲的文章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为了一封信的事。

这是一封由毛主席亲自写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将军的信。

1949年1月13日傅作义派“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将军前来进行第三次谈判，双方气氛很融洽。16日谈判结束时，决定派父亲随邓一同进城，林彪把这封信当面交给了邓，要他回去交给傅作义。因信未封口，林彪走后，邓马上抽出信来看了一遍，看完后，很惊讶，说：“这封信太出乎人的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这一情况，父亲马上向林、罗、聂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后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在进城的路上，邓又提出暂时不交那封信的事，父亲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

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签订后，父亲接到回通县宋庄向总前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指示，一到宋庄，罗荣桓政委就问：“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父亲回

答：“不清楚。”聂荣臻司令员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傍晚，父亲回到城内，找到了邓宝珊将军，问他给傅作义的信交给他没有。邓愣了一下，困惑不答，于是便提出与他一起去看望傅，把那封信交给傅。邓带了信与父亲一同乘车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傅与父亲交谈中，邓乘机到傅的内屋去。后来李明灏来看望傅，父亲就告辞了，与邓各回自己的住处以后，听说邓把那封信交给了傅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傅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从父亲文章中的这些描述，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两点：一、《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之前，傅一直未看到这封信。二、从总前委对这封信的重视程度看，很可能是总前委接到中央甚至是毛主席的指示和催问。

父亲在这封信的处理上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首先他还是与邓一起带了信去了傅那里，但却没有像一个革命军人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命令。在到了傅的住处时，他既没有当着傅的面让邓把信交给傅，也未向傅提起有这么一封信的事，在与傅告别时也未向邓追问这封信是如何处理的。

从傅作义事后看了信的反应来分析，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军人来说，当时看了这封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性质的信后，对和谈的态度是否会有改变也是难以预料的。

父亲当时采取这种处理方法并没有考虑事后是否会追究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更多的还是从和谈的实际利益出发的。父亲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战争年代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但从我上中学以后，我就开始注意到，每当他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思考，经常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睡觉。他的那种处事谨慎细致、反复推敲、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工作作风，一直贯穿在他一生的革命工作中。

(责任编辑 吴思)

代购代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思 痛 录	韦君宜	13.00	3.00
朝鲜战事	徐 孔	53.50	4.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4.00
忆 周 扬	主编：王蒙 袁鹰	36.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石破天惊	张淇彬	29.00	4.00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马寅初

与《光明日报》 的恩恩怨怨

● 邓加荣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他很喜爱这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不仅时常接受报社的记者采访，而且他的一些文章也愿意首先送到《光明日报》和它所领导的学术刊物《新建设》上发表。马老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很关心《光明日报》对北大教学改革报道，支持北大教授翦伯赞、邓广铭、金岳霖、陈岱孙等教授为《光明日报》编辑《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颇有影响的专刊。

但是谁也意想不到，1958年，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指使下，却是《光明日报》带头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他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学观点即“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的批判。

马寅初作为经济学家，一直关心我国的人口问题，50年代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在全国各地历次视察中就已发现到，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严重性。他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发出呼吁，提醒人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希望国家能够适时地加以关注和解决。后来，他被请到中南海紫光阁，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许多人表示赞同。他那篇长达5万字的《新人口论》也因此得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一时全国为之轰动，各地许多来

信，无一不对马老的卓识表示赞同。

但是在1957年掀起反右派斗争之后，马寅初所提出的这个朴素的真理却无端地遭到非议和攻击。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持与马老相同观点的专家、教授如陈达、吴景超等人，都相继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至于马老本人呢？可能因为他德高望重，影响太大的关系，一下子还没有被列入到右派的行列，但已经滑到“危险”的边缘了。有些文章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人口论”时总要含沙射影地指向马老。

到了1958年4月，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这里差一步就是没有公开点出马寅初的名字罢了。

在这种形势下，《光明日报》公开批判了马寅初的观点。1958年4月19日和26日《读书》专刊第三、四期先后刊登了批判“新人口论”和“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的两篇文章。马寅初对于这场批判早有思想准备，在北大内部批判时，他就胸襟坦荡地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我倒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

惯了冷水澡,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马老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的。因此,他便接连写了两篇答辩文章给《光明日报》,有的长达2万5千字。《光明日报》在5月9日刊出马老的答辩文章《再论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时,文前加上《编者按》说:“我们认为,这个讨论涉及到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若干根本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问题,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欢迎学术界人士发表意见。”此文一发表,不仅在《光明日报》上,而且在其他一些报刊上面也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批判文章。仅就《光明日报》而言,在4月至7月短短三个月内就发表了27篇,而且其中有11篇是来稿综述,这些文章的批判气氛相当激烈。在这一段时间内,如果再加上《新建设》、《经济研究》、《理论战线》、《学术月刊》、《计划经济》、《教学与研究》等刊物的批判文章,总数超过了200篇。

然而,这些文章尽管调门喊得很高,火力相当猛烈,但却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讲道理少,扣帽子多。马老看了,一拂袖子气愤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1959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发表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写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3篇文章时,又发表了一篇长达500余字的《编者按》。按语说:“经过三个回合,马寅初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观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同时,也使不少人深入一步地理解到不同学术观点大争大辩的必要性。”在这里已经没有一点民主讨论的气味,而是以势压人,把一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帽子扣到了马老的头上。既然问题已经定了性,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马寅初是一位有着坚硬脊梁骨的人,面对着全国上上下下黑鸦鸦一片批判文章,老人既不气馁,也不苟同,抱着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细心地阅读那些批判他的文章。不论是大人物写的,还是小人物写的,只要其中含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他都虚心地接受过来。他在一篇题为《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的声

明中就明确地说:“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文章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收过来”,而且立即按照这些意见修改他已发表的文章。但是,对于那些只会用帽子压人、不讲科学、不讲道理的风派文章,他是深恶痛绝的,只要见到那些不顾事实、不讲道理的文章,他马上就不顾一切地挺身回驳,据理力争。1959年秋天,马寅初又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送给《新建设》,进行更加有深度的论战。在文章末尾还写了两个《附带声明》,其中一个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据去年7月24日到11月29日《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当时,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接到马寅初的反驳文章和《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后,马上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紧锣密鼓地进行动员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来他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了辫子。过去对马寅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参加。因此,还没有打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我们应当应战。他现在迫不及待,大家就要考虑一下,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接着又说:“由此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分子少数人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家等了八个月之久,要挑战,我们应战就是了。《新建设》11月初出版,12月初开始批判。发表他这篇文章可以写个《编者按》:‘我们根据作者的要求发表这篇文

章，供大家讨论！’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过去的政治不要联系。马寅初，这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看看他过去的经济理论，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

康生当场还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作了布置：“你们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12月23日，他又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示说：“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这一下子，康生把一位敢言敢怒、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受残酷迫害的民主爱国学者同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划了等号。

《光明日报》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组织力量，大登批判马寅初“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1月，《光明日报》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了4篇，其他各种报刊发的文章已经无法统计了。

面对这新一轮更加严峻的围攻形势，马寅初依然毫不气馁，他于1959年12月间又写出一篇《重申我的请求》（发表于《新建设》1960年第一期上），文章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所发表的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不过，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登了庄次彭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



马寅初(左一)任北大校长时迎接周恩来总理

体胖’了。”

在《光明日报》所发表的那些名曰讨论实则讨伐的文章中，几乎篇篇都把马寅初与马尔萨斯联系起来，他们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模一样，把人口多、人口增加当成社会的负担，“这同马尔萨斯牧师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唯心论，”是“对党领导下的6亿5千万人民力量的轻视。”

说实在的，那些批判马老《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的人，有许多人根本没有看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也闹不清马老的《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观点到底有何异同，只是跟着人云亦云地胡乱扣帽子而已，马老对此当然不服。

马老在论战中不断申明，多方论证，反复地向人们解释说：“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马尔萨斯认为，粮食增长速度总是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而“新人口论”则认为粮食增长速度可以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前提是严格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所以，马老理直气壮地说：“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

马寅初的申辩不但没有让批判者们看清“新人口论”的合理性，反而更加激怒了组织这场围攻的“理论权威”康生。马老的辩论文章刚刚发出不久，康生就到北京大学批判座谈会上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姓马克思的马，还是姓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如此强词夺理，可见已无民主可言。

这时的马寅初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了。早在此之前，曾有不少好心的人向他劝说，希望他尽早引退，认一个错了事，不然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地位。对于这些劝告，他自然感激，但前思后想却不能实行，他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最使他感到痛苦、让他辗转反侧、焦思苦虑的是，周恩来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和保护，同他作了一次艰难的谈话。为此他思考了整整一夜，最后还是在《附带声明》后面，又赶紧补写了一段话，用了一个《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的小标题。他在文中说：“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先是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刊》，后又发表在《新建设》上，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就被迫

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从此，他便远离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像一颗闪光的明珠悄然无声地隐没下去，默默无闻地幽居在东总布胡同32号的自家小院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马寅初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8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其间的过程是这样的：这一年三、四月份召开人大、政协会议时，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商讨国家发展大计时，提出了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那就是无计划地超生滥生，拖住了现代化的后腿，给国家带来了许许多多无法解决的困难。人们惋惜地说：我国人口如果只有六、七亿的话，日子该多好过呀！于是，马寅初这个已被人们遗忘了很久的名字，又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7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龚明”写的《如果没有民主，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应当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的文章。文章说：“最近许多人谈到控制人口问题，不约而同地谈起马寅初先生。前几天看到北京市人大代表辛育龄先生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其中提到‘有的同志’在我国人口还是5亿多的时候，就提出了‘节制人口’的主张。我体会，这中间也包括了马寅初先生。”“当二十多年后控制人口已经成为一项重大国策的今天，再回想起马寅初先生当年富有远见的提议，不能不使人异口同声以非常痛惜的语气说：如果当年就采纳他的主张，采取措施，何至于今天。二十多年来我国人口问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寅初先生当年的预见是非常正确的。今天，完全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当年为此而加在他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7月2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该报记者采写的《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马寅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学经济的人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的经济学上研究生产，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建设带来很大困难，再不解决人口问

题不行了。”

他接着说：“我平日里不教课，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万余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到困难就低头。”在谈到过去错批“新人口论”时，马老听了笑道：“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实在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的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该报在文章的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按语说：“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是远见卓识的理论，是利国利民的理论，当时那种批判是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践踏。1958年4月19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的正确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和来信，就是为了清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彻底平反。”

同时，在该版的下边还发表了北京市饲料研究所朱湘远（现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主任）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和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贾真的《这个不平鸣得好》等读者来信。

同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又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大块文章《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战略任务》，文章指出：“在50年代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的正确主张，今天已经清楚地看到由

此造成的严重恶果。”

197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4日，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接着他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刚刚成立的全国人口学会名誉主席。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二十五年前，当《光明日报》首先发难接着全国各地报刊群起围攻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时，马老曾满怀信心地说：“将来总会有一天，历史和现实都将证明我是对的。”今天，历史和现实都对马老的“新人口论”做了验证，马老作为一个历史的预言家得到了完全的胜利。但是马寅初也不无苦涩地说：“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严重损失来证明一个人的预言的胜利，那样的一个胜利之果，是预言家所不愿吞咽的！”

不过，马寅初对平反一事终究是非常感动的，他说：“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伟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79年9月15日，因50年代提出节制人口建议而受到批判的马寅初获得平反，就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图为北大学生代表向他表示祝贺

编者按：今年6月3日是我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先生的99岁华诞，东北大学校友会及张先生的亲友故旧和有关方面领导人在北京集会祝寿。本刊特邀张先生的外甥孙女王秦女士著文庆贺，现全文发表如下。

拜望舅公张学良

● 王 秦

1998年5月我们飞越太平洋赴夏威夷去探望居住在美国的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夫人。这是自西安事变以来，中国大陆的亲属首次赴海外探望张将军。归来之后，很多亲朋好友、东北方面的乡亲们及各个方面的人士都十分关心张将军的情况，纷纷来信来电话询问。为报答大家的关心，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探望张学良将军是 我们家族四代人共同的心愿

我是张将军的晚辈亲属，他是我母亲的舅舅，是我外祖母张冠英女士的弟弟。因此我称他为大舅公，东北话就是大舅爷。

张将军共有手足十四位：一位姐姐、五位妹妹和七位弟弟，兄弟姐妹感情很好。尤其是与姐姐张冠英女士及二弟张学铭先生，一母同胞更为亲密。他们三位早年丧母，儿时朝夕相处，少年时共同成长，成年后互相惦记，感情十分好，在张将军被扣前来往密切。

看望张将军是我们家族四代人共同的心愿，早在1936年张将军刚被扣押的时候，家族内部就作过大量的努力，希望能去看望张将军并试图营救他。我外祖母曾经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探望张将军，但未能实现。二舅爷张学铭先生和四舅爷张学思将军也都作了很多努力。……1949年大陆台湾隔岸相峙，台湾海峡成了亲人

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家人们从未放弃过希望。

我姥姥张冠英一直十分想念张将军。50年代她住在北京西城扁担胡同二号，就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南面，那里原先是张氏帅府的前院。月亮门内是个小小的院落，有几间平房，种植着几株雪白的珍珠梅，十分雅致。到了夏季，粗壮的金合欢树开满粉红色的伞形花儿，院中飘着淡淡的花香，很是阴凉。我当时读初中，常去看望她老人家，陪她说话聊天，也帮助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我经常看到姥姥把张将军从贵州和台湾看守所中寄来的信和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并一再地对我母亲说：“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他们，他们两人关在那里，实在是太苦了！”姥姥对张将军的旧部很好，常有一些东北的老人去看望她老人家，于学忠、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先生时有走动。

二舅爷张学铭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我长大后常随张学铭出门、开会和见客，也常在家为他撰写文稿。1983年张学铭病危，二舅爷的儿子张鹏举舅舅和我一起守护着他，为他做遗嘱录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非常吃力地说：“我想念我大哥，我想见见大哥！将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他！”

我母亲鲍毅女士称张将军为大舅，她年少的时候常随大舅一起出游，受到张将军的影响，很富于爱国心。张将军被扣后妈妈参加了东北

参加夏威夷生日感恩会 为张将军祝寿

我们于5月30日抵达夏威夷。5月31日上午参加中华基督教会教堂为张将军举办的生日感恩会。这次来祝寿的人很多。有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和夫人吴克良、东北大学代校长宁恩承及女儿宁克嘉、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才、周广有、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左铁镛、台湾前立法院院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及儿子梁大琥、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美国的王冀夫妇以及北京电视台、辽宁和海城的同志们，还有世界日报的记者高振华和夏威夷当地的亲朋好友一起为张将军贺寿。

上午九时张将军夫妇在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来到教堂。张将军气色很好，精神健旺，挥手和大家打招呼。赵一荻夫人因不久前手部摔伤，右臂还绑着绷带。见到老夫人带着伤出席感恩会，大家又高兴又担心，为老人家的坚强与爱心所感动。来自世界各地的的亲朋故旧纷纷走上前向张将军夫妇表示祝贺与问候。问候与合影过后，在程嘉禾牧师的主持下，开始了生日感恩会。大家先唱诗敬颂耶稣基督，又向张将军敬送了鲜花与礼品，接着十几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小朋友为张将军歌舞祝贺。张将军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表示感谢。由于张将军年事已高，由他的长女张闻媛女士代为宣读了由张将军亲笔签名的生日感恩致辞。致辞如下：

“今天是我九十八岁生日，我应当感谢赞美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么多年来，主赐我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能常去教堂主日崇拜，主的恩典真是数说不尽，感谢不完，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诗72:5）。

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恩典够我用！

我要敬告大家，应当快来信耶稣，得永生。

救亡总会的工作，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斗争中。妈妈认为张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她认为张将军的爱国精神最彻底、最坚决、最大公无私，为了爱国，为了抗日，他什么都舍得，什么都肯牺牲。权力、地位、财产、军队、家庭……以及他自己终身的自由，全部都贡献给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张将军所代表的这种崇高的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和力量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去爱国心是没有前途的，也没有光明，将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妈妈希望我从事历史研究，收集和整理张将军的资料，将他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传之后世。后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家族史的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近代史所的培养和支持下，我参加了《西安事变资料》和《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的编辑与编写等等工作。与许多当年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一起，研究有关的历史事实，查阅档案，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妈妈还盼望有机会能领着我们跨过台湾海峡，去看望家中的诸位长辈……。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住着我的大舅爷张学良和大舅奶奶赵一荻夫人，还有太奶奶、五舅爷张学森先生夫妇、六舅爷张学俊先生夫妇、七舅爷张学英先生夫妇和六姨姥姥张怀敏教授夫妇，还有我的二姨、三姨和大舅，以及众多的表兄弟表姐妹们。还有一些亲属散居在美国、加拿大和世界各地。

但海天相隔，老一辈的亲人们没能够等到这一天，姥姥、妈妈、二舅爷、四舅爷、八舅爷……都先后谢世了。他们将这个心愿留给了我们，嘱咐我们去实现。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星移斗换，到了90年代，探望张将军终于有了可能，1998年5月我们赴夏威夷去看望他老人家。此行共六人，其中有张将军的侄子、天津市政协委员张鹏举先生及夫人吴量绩女士。还有我和我的丈夫——清华大学工程师于杰先生。

他的恩典够你用的。阿门！

张学良

6月1日1998”

张将军的孙子张居信也专程来为爷爷贺寿。见到我们，他一边给爷爷推着轮椅一边跟我们打招呼。张居信是美国的电脑专家，1996年曾应邀来北京参加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12月12日上午在政协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接见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亲属，合影留念。晚上李瑞环主席和王兆国在人民大会堂宴请



张学良看大姐张冠英的照片(持者王秦)

大家。当夜张居信又与我们在四川饭店小聚欢聚家常。此次夏威夷重逢都分外高兴。

5月31日在美国的中国东北同乡会为张将军举行了祝寿宴会，张将军的儿子张闾琳和夫人陈淑贞、女儿张闾嫒及女婿陶鹏飞代张将军夫妇出席。东北同乡会主席肖朝智主持宴会，阎明复、宁恩承、梁肃戎、左铁镛、赫冀成、张鹏举和王秦等诸位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祝贺张将军生日快乐，并呼吁加快促进祖国统一的进程。

晚上台湾前立法院院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及儿子梁大琥宴请大家，来自美国和海峡两岸的亲朋欢聚一堂，为张将军的健康长寿与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干杯。

拜见张闾嫒表姨和陶鹏飞姨父

6月1日下午我们去假日饭店拜望大表姨张闾嫒和姨夫陶鹏飞，他们是从旧金山专程赶来为大舅爷张将军贺寿的。

张闾嫒女士是张将军的长女，也是惟一的女儿。年轻时她曾留学欧洲，后来定居美国，她与我母亲是表姐妹。大表姨和我妈妈是太爷爷家最早出生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的出生给沈阳大帅府带来喜庆与欢乐。幼年时妈妈常随姥

姥回帅府小住，那时候她胖墩墩的，正蹒跚学步，喜欢在帅府老虎厅中藏猫猫，躲在老虎身后或腿边，等着小朋友来找她。大表姨大约就是当时的玩伴之一。……后来家中不断发生变故，她们也渐渐长大了，表姨出国留学，妈妈参加了抗日斗争，联系中断了许久，但大表姨与我在台湾的二姨三姨都有来往。这次在夏威夷见到大表姨，尤为亲切。

先是谈到姥姥。表姨和姨父称姥姥为大姑，问了许多关于大姑的事儿。尤其是陶鹏飞对姥姥特别有兴趣。一见面就问我：“听说大姑特别厉害，是吗？”我想：可能他没见过姥姥，但常在家里听大舅爷和家人说到姥姥，及姥姥的各种轶闻与传说，感到难以想象。这会儿见他大姑家来的孩子可要问个明白。我说：“别人都说姥姥挺厉害。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姥姥跟我在一起时总是挺高兴的，姥姥让人给我和弟弟做好吃的，跟我下棋，还给我梳小辫……都和气着哪。过年过节有客人来看望她，给她磕头拜年，她都给赏钱，也挺和气的。”我与姥姥在一起时，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弟弟还只有六七岁。我们总是感到跟姥姥很亲近很亲切。长大以后总是很想念她，因此对姥姥家里的人自然就亲切融洽。接着我又说：“姥姥很想念大舅爷，总是惦记着要来看大舅爷，也想念我二姨三姨和大舅

……”后来又说到我二姨、三姨，前几年二姨去加拿大看望三姨，她们遇到一次车祸都受了伤。表姨和姨父很关切的询问她们的近况，并让问候她们。

陶鹏飞先生是美国的大学教授，对祖国大陆的大学教育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十分关心，再三询问。我将知道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并将带去的绘有清华大学校园风景的钛合金画，送给陶鹏飞作纪念。

正在我们谈话时，台湾《传记文学》期刊的发行人刘绍唐拿着昨天在教堂与张将军合影的底片走过来，准备去加洗照片。见到我们，他走过来打招呼，并参加谈话。刘绍唐说：“王秦，近代史所的历史学家。我看过你的文章，是研究西安事变的。”我说：“我们都很喜欢读您办的《传记文学》。我们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收藏了很多的《传记文学》。欢迎您来近代史所学术交流。何时您来北京，我去看望您。”第二天我们与刘绍唐又在希尔顿饭店相遇，同见张将军，看来是挺有缘分的。

在希尔顿饭店拜见张将军

希尔顿饭店是世界最著名的饭店之一，座落在夏威夷海滨，是一片精美的建筑，到处装饰着典雅的艺术品，置身在其美丽的厅堂和庭院中，如同进入艺术的画廊，美不胜收。尤其是夜晚，无数的小火炬代替路灯照亮夜空，小小的火炬发出跳跃着的变换无穷的光焰，将周围的一切映照得美仑美奂，鲜花、彩灯、喷泉、流水……互相辉映，充满了神奇与浪漫的色彩，让人感到夏威夷之夜像梦幻一样，真是无比奇妙！不愧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游览胜地。6月2日上午我们去希尔顿饭店再次拜见张学良将军，阳光洒满大厦间的绿地与小径，照耀着我们走向前去。

上午十点多钟，张将军乘轮椅来到我们中间，他老人家精神很好，面色红润，见到我们很高兴。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示意。他内穿白衬衫，外罩一件深色有细格的夹克衫，着蓝灰色长裤、

皮鞋，戴着一顶深色的遮阳帽，还戴着一幅大号的的眼镜，显得挺精神。据随行的家人讲张将军身体情况良好，虽是近百岁的老人了，但没有一颗假牙，胃口很好，吃东西挺香，尤其喜欢吃水果。前不久刚作了体检，内脏各部分都没有问题。见到大舅爷我心里十分激动，几代人的心愿，终于在今天实现了！首先我们给大舅爷见礼，张将军以长辈身份坐在轮椅中接受了我们的鞠躬和跪拜。我们向他老人家报告了家中的情况：先说姥姥和二舅爷十分想念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来看望他，又说了四舅爷、八舅爷、二姨姥姥、四姨姥姥的情况。张鹏举对他说：“大爷，我爸爸临终前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西安事变后见到我哥哥’。告诉我‘无论如何你也要去见大爷一面’。”我还特地带去了姥姥张冠英女士的照片，大舅爷关切地问起姥姥的情况，随后又问起家中其他亲人的状况，亲切地和我们叙家常。他老人家听说自如，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对往事记忆得很清楚。张将军与在大陆的兄弟姐妹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十分关心他们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插上一二句话，带着浓重的东北乡音。可以感受到张将军对家中兄弟姐妹的情况比较了解，言语中流露出他对大陆亲人们的关心与思念。

然后我们送上各自的寿礼，张将军都微笑地接纳了。张鹏举送上二幅书画立轴，一幅是松鹤图，一幅是寿字。我送上一盒精致的京剧脸谱，见到红色的锦盒，张将军很有兴趣地问：“这是什么？”我说：“是京剧脸谱，泥塑彩绘的。送给您老人家欣赏。”打开锦盒，张将军一见到脸谱便乐了，很高兴地说：“这挺好看的。”

此次赴美前，东北大学的老校友邱琴托我给张将军带去一封信和一本《东北大学史稿》，白竟凡托带一本书《张学良将军与东北军研究文集》。我将他们的礼物向张将军作了介绍，并放到将军手上。张将军收下后，仔细地翻看了东大史稿，表示要收藏起来，他对东北大学十分关心，每年都亲自接见东北大学人员的来访。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感觉到张将军十分关心大

陆的情况，关心东北家乡和亲人以及旧部、学生们的情况。张将军对祖国大陆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少。

在谈话中还说到我的儿子于泓很想来拜见他老人家。但因为还在上学未能成行，想请太爷爷作个签名，留作永久的纪念，张将军很爽快地表示可以，挥笔在我带去的夏威夷明信片上签下了“张学良”三个大字，十分遒劲有力。跟着又为张鹏举签了名。随后我们和张将军拍照合影，并陪同张将军去海滩散步。

夏威夷的海滩阳光明媚，碧海与蓝天一色，无边无垠。雪白的浪花在脚边翻涌，高大的棕榈树迎风摇曳，五彩缤纷的鸟儿在奇花异草中飞舞，温馨宁静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在微微的海风中，我们与张将军边走边说，直到中午时分才恋恋不舍地与他老人家告别，相约以后再来看望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双手合揖与我们道别，并说：“谢谢！谢谢！”后来家人告诉我们：“见到你们那天，张将军特别高兴，散步聊天的时间都特别长，比往日长得多。”

第二天家里的人请我们在日本餐馆聚餐，对我们说：“你们真有福气！我跟随张将军很多年了。他很少为人签名，尤其近几年几乎从不签名。昨天提笔给你们签名，真是难得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听后十分感动，心想大舅爷对我们真好！这都是托了姥姥与二舅爷的福啊！

亲人团聚、祖国统一 是时代大潮的总趋势

近百年来我们的家族与东北人民、东北军、东北大学一起历经战争、分裂的种种磨难，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过来，饱受家破人亡骨肉离别之苦。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与入侵，使我们亡省亡家流亡关内。1936年为了争取全国抗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却被扣押在南京。张将军被扣后，为了继续抗日，张学思将军走上抗日的战场，参加冀中

抗日战争，后来又挥军北上，参加指挥解放家乡东北的战斗。随后我母亲、我二舅也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家中的长辈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到了“文化大革命”长辈们又遭迫害，张学思将军被害死在监狱中，张学铭也进了秦城大牢……。数十年来我们的家族不能团圆，不能聚合，骨肉分离天各一方，隔海相望日夜思念。

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送暖，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不断改善，亲人们渐渐能互通消息，进而探望，海峡对岸的亲人又回到祖国大陆，分离多年的骨肉在北京团聚了，才有了98年的夏威夷之行。

这次探亲万里迢迢，困难重重，这是中国大陆的亲属首次去海外探望张将军，是我们家族在几十年的离散之后，一次十分重要的聚合。在我们家族的历史上，这是件可喜可庆的大好事，经过了数十年的准备与酝酿，在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终于实现了。这是历史给予的机缘，也是众人的心意。在此特对给予帮助的各个方面、各位长辈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从我们这个百年家族的离散与聚合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说明了个人、家族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时代的潮流推动我们向前，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团结、统一而奋斗，是张学良将军和我们家族中几代人共同的理想与目标。当此世纪之交，21世纪迎面而来，我们的家族又重新聚合了！这是祖国统一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祖国统一的洪流推动了我们骨肉团聚。同时这也表明祖国统一的进程脚步很快，深受中国人民和广大海内外华人的拥护与赞助！

愿我们的祖国统一富强！愿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加繁荣昌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闻非）

东北易帜始末

● 于耀光

1928年春，因宁汉分裂而搁置一边的北伐任务，随着宁汉合一，又重新提出来了。1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着各总司令该日会师幽燕令》。改第一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代总司令）；改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任集团军总司令；改阎锡山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任集团军总司令；改李宗仁的第三路军为第四集团军，李为第四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参加北伐讨奉的总兵力约7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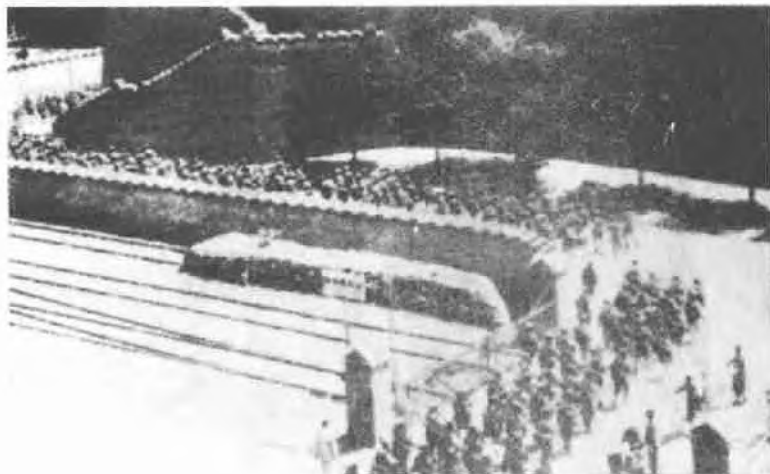
此时，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是北洋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他控制的北京政府。张作霖于1926年12月10日通电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取得了北洋军阀霸主地位，并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正式组织安国军政府。是

时，他所统治的地盘，除了东北三省外，还有京、津、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及山东大部、河南一部分等广大的东北、华北地区。他的军力同北伐军旗鼓相当，号称百万大军，实际也有五六十万，以奉军为主，杂以其他军阀残部，装备优于北伐军，但战斗力不强。张作霖为了对付北伐军的进攻，加紧调兵遣将，任命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南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京汉、正太线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绥远方面总指挥。摆开战场，准备迎战北伐军。

国民革命军于4月5日在徐州誓师北伐，也就是史称的二次北伐，4月9日下达了总攻击令。

张作霖对应战略，东线取守势，西线取攻势，集中奉军主力，取三面包围之势，攻击阎锡山集团，得手后再转移兵力对付其他集团，但因东线张宗昌、孙传芳部战斗力太弱，经不住北伐军的攻击，迅速溃败，4月30日张宗昌即放弃济南逃到德州。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由于东线的溃败，逼着西线的奉军，由进攻转入防御。

正当北伐军大举向北推进之际，日本政府决定武装干涉，力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4月19日，日本举行紧急内阁会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案》，急令第六师团5000人海运青岛，并令日本驻天津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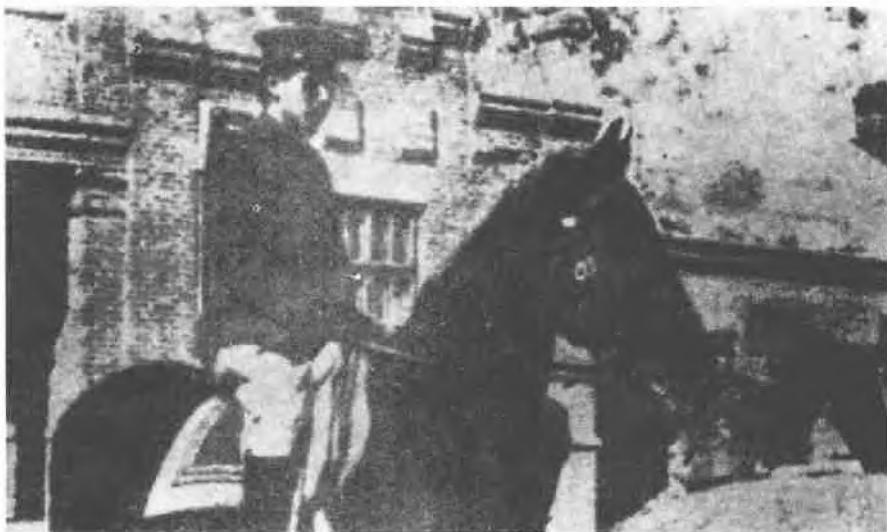
奉军退出北京之情形

个中队日军沿津浦线南下，于5月3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残杀我军民数千人。据国际红十字济南分会调查统计，我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

5月12日，南京政府在兖州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对日本继续采取妥协政策，绕道北上。

日本政府对张作霖一方面支持他对抗南京政府的北伐；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加紧施压，要张承诺把东北三省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完全控制之下。

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代表日本政府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分致所谓“觉书”，声明：“战事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满洲时，……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意欲威胁更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芳泽。芳泽要挟张答应增修五条满蒙新铁路，企图进一步加强对我东北的侵略和控制。张作霖觉得若是答应这一要求，无异于引狼入室，回应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芳泽说：“只要你答应这一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回答说：“我们家中的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前检阅部队

事，不劳邻居费心了。”⁽¹⁾

5月25日，张作霖正式答复日本“觉书”，：“东北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²⁾

日本对张作霖未能在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方面完全满足其要求，甚至还有所抵制，久已不满，现在更觉得张不听日本使唤，因此，决意换马，抛弃张作霖。

战场形势对张作霖极为不利。东线北伐军占领了沧州，西线北伐军占领保定、张家口等地，对京、津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蒋介石希望与张作霖达成妥协，和平接受京、津。于是蒋授意上海商会发出主张息争的通电。张作霖开始是不赞成的，还想和蒋、冯、阎、李决一雌雄。但是，作为奉军主要将领的张学良对他父亲张作霖穷兵黩武，热衷于中原逐鹿，是持有异议的。

第一次北伐战争时，张学良将军就向往国内和平和统一，在河南前线，他和韩麟春在1927年3月22日通电全国，提出“息争御外”的和平主张，但是，张宗昌、孙传芳作梗，未能实现。

这次战争爆发时，张学良将军从前线发密电给周大文、胡若愚，要他们在大帅府酝酿停战气氛，要危道丰持他名片，兼程南下，谋求和平。就在张学良回京着手办此事时，又受到张宗昌、孙传芳的干扰，一时受阻。张、孙部东线溃败，形势急转直下，张学良抓紧时机，派葛光庭赴上海与何成浚密商，何要葛急电张、杨，让出京、津，退守滦东，再图善后。张、杨表示同意，要国民革命军不要紧追。张先将奉军收缩于保定，再向滦东转移，摆脱被围之势。同时，张还接受杨宇霆建议，策动东北三省议会

联合会会长范朗清赴京，呼吁大元帅回东北坐镇。

但是，这许多努力，都未经张作霖的首肯。这次张学良返京，打定主意，力劝父帅张作霖，罢战言和，撤军回东北。开始张作霖听了张学良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撤军的主张，大发雷霆，说：“我当陆海军大元帅，还不到一年，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小子要撤军，是要拆我的台。”又说“你说北伐军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统一中国，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也没有，不能统一中国，我不相信你小子的话。”又说：“什么三民主义，我还是四民主义，东北军人强马壮，兵多，飞机多，大炮多，大豆多，占有八九个省的地盘，北伐军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四条腿的骑兵，我怎么不能统一中国呢？”又说：“你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带几十万大军不打仗，跑来要我撤军，我不撤。”头一天，张学良的肝胆之言未能说服父亲张作霖，次日，张学良如申包胥哭秦庭，又去恳请父帅撤军。他问父亲：“蒋介石是哪国人啊？”“是中国人嘛，你问啥？”“冯玉祥、阎锡山是哪国人啊？”“也都是中国人嘛！”张学良接过来：“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多一点，谁占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的地嘛？咱们东北要丢掉了，就不是中国人占

了，而是日本人占了，咱就要当亡国奴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他又说：“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是空城计，不撤不行。”张作霖是个粗中有细的军阀首领，听了张学良一番良苦的劝告，揣度着如今之计，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他称赞说：“还是你讲武堂毕业的有点眼光，看得远，咱们撤。”“现在请我在北京当大总统，我也不当了。”⁽³⁾于是急电上海商会同意息争。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军事会议，向奉军下令总退却。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以不忍“同室操戈，喋血京畿”为由，率部退出北京。6月8日，北伐军和平进驻北京。南京国民政府终于以和平方式接管了北京政府和京、津地区，避免了京、津喋血，此一历史功绩与张学良的和平努力有直接关系。同时，北京和平解决是东北易帜的前奏和序幕。

6月4日晨，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穿行于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老道交叉处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预先埋设炸药引爆，张的专列被炸毁，张身负重伤而亡。在这个历史悲剧中，一代枭雄张作霖到死时还未想到日本人对他会下此毒手。他在启程回奉天前，曾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齐称老道口近日来日方不许行人经过，

十分可疑，望加防备。可是张作霖接电后，不仅未加防卫，而且还去电吴俊升，申责齐“好造谣言，现日方对我修和，勿庸顾虑”。

发生皇姑屯事件的当日，张学良正在北京组织指挥几十万东北军撤回东北事宜，他接到父帅遇害的密电后，同杨宇霆于午夜带卫队营秘密离京，至栾县下车，黄显声旅长到车站迎接，张住进山上一个庙里，指挥军务。为防不测，张按黄显声建议，化装成士兵，于6月17日乘军列潜回奉天。18日，接任奉天督办，22日，为父张作霖发丧公祭。

张作霖死前，曾留下遗嘱（由他的秘书谈国恒手记）：张学良继任。但张学良认为，自己年轻资浅，推举张作相继之。

6月24日，奉天省议会和吉、黑两省的代表，一致推选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万福麟为奉、黑两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谦而不就。7月2日，东北三省议会一致推选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28岁的少帅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学良将军，壮怀激烈，不为手上沾满鲜血的日本强盗所吓倒，不为东北集团内部亲日势力、保守势力所干扰，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实现中国南北统一的大业。

张学良将军认为，东北易帜能否实现，先要东北集团内部取得共识，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顶住日本人的干涉，才能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谈判。于是他反复耐心说服东北高层人士明了民族大义，“东北易帜与否，关系到东北的前途安危，也关系到国家的大局，是统一，还是分裂？”经过张的说服和坚持，东北政要对东北易帜取赞成和附和态度。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和平解决北京之后，6月20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至此，山海关内都挂青天白日旗，只有东北三省尚挂五色旗。蒋、冯、阎、李齐集北平，商量如何解决东北问题，冯、阎由于夙怨，主张乘胜追击，一举消灭奉军，以绝后患。然而蒋介石却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主张和平解决，一是可避免兵出山海关遭到日方干涉，二是保留奉张，日后为我所用，和平方针遂定。

其实双方的和平努力已先期展开。6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周震麟在北京发表谈话，说现在张作霖已亡，今后政府对关外奉军当以政治方式解决。7月1日，张学良将军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政府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绝对不妨碍统一。

7月3日，蒋介石对日本东方社记者谈话，声明要和平

解决东三省问题。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代表赴北京会见了蒋、冯、阎、李，之后蒋又单独会见，提出：“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均可商量。”张学良早有联蒋思想，今得知蒋对东北的态度，旋即复电同意，表示“愿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于是张、蒋代表在北京六国饭店商妥，东北定于9月中旬实行易帜。应蒋要求，张令热河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易帜。

日本是极力反对东北易帜的。因为，东北易帜对于日本企图把东北三省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是极为不利的。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军部态度特别强硬，认为“满洲脱离中国本土业已成熟。”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即说：“这里得到情报，此事是南方便衣所为，”是想制造混乱，乘机占领奉天以及东北全境。由于张学良等处置得当，严密封锁消息和保持奉军稳定，使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张学良继任父职之后，谋求易帜，同南方统一。日本便不顾国际公认不干涉内政的准则，出面干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转达田中首相的信函，反对东北易帜。热河易帜后，林又见张学良递交了书面警告。张以易帜是东北三省当局和三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张，我不能违背为由，顶了回去。

接着日本又派侵略中国的老手林权助为日本政府特使赴奉天悼唁张作霖。名为悼唁，实为向张学良施压，阻止东北易帜。悼唁时，林权助拜访张学良，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⁴⁾8月9日，张学良只带着翻译王家桢一人，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同日方会谈，日方参加会谈的除林权助外，还有林久治郎、佐藤安之助(田中外事顾问)。会谈开始，首先是林权助大放厥词，什么“满蒙是日本付出重大牺牲而得到特殊权益的地方，它是日本大和民族的生命线，不能不时时刻刻关心。”又说：“如今国民革命军席卷华北，不知什么时候到满蒙，听说张将军随时准备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不知是否属实。”要张学良将军予以澄清。为了稳住日方，张学良将军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和义愤，作了有理有节的回答：“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又说：“至于国民革命军，我们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们很佩服他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同他们来往，至于以后，我现在还不能断定。”张又加重语气说：“好在这些都是我们家里的事，我

们的内政，我想我们邻邦也是我们友邦日本，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日方听了不悦，接着林久治郎气势汹汹地说：“帝国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就被指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请司令三思。”张学良理直气壮回答：“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东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

双方争执起来，林久治郎却用命令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责问林权助：“这是什么意思！”林权助见硬的一套不灵，就换上软的一套，笑着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的利益打算。现在张将军在东北唯我独尊，同他们合流后，还能比今天的地位更好吗？你也不必害怕他们，我们是绝对支持你的。”拉拢张学良闹独立，在东北称王，充当日本傀儡。这对张学良来说简直是一堆粪土，不过也为他提供了契机，正好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忍辱负重，装出同日本修好的态度，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⁵⁾这既稳住了日方，又使自己有回旋的余地。张于会后致电蒋介石，叙述同林权助会谈时，林对他施加压力的情况。张提出的对策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

足，即使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⁶⁾

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希望东北三省早日归附中央。先派方本仁和何千里赴奉天，悼唁张作霖，并向张学良表示无进军东北之意和和平统一的途径。方、何代表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会见时如遇故人，极为亲切。张学良向方、何倾诉和林权助会谈时所受到的凌辱，愤懑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鸟总司令。”说着泪涔涔而下。方、何用好言慰藉，并表示，日本人野心难测，换旗之事不能操之过急。紧接着，蒋又派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到奉天张学良处游说，希望张尽早换上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则诚恳表示，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立即易帜有困难，担心日本人趁我局势未稳，进行干涉，同时内部也有阻力，需要做工作，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

日本人剑拔弩张，对张学良和奉天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8月13日，日本关东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炫耀武力，扬言要制造第二个“济南惨案”。为防不测，张学良同东三省临时保安会和东三省

议会联合会反复商量对策，决定易帜推迟三月举行。张报告了蒋介石，提出统一初衷不变，易帜推迟实行，得到蒋的谅解和支持。

张、蒋还联手利用英、美在华利益上同日本的矛盾，推动英、美向日本施加压力，利用日本朝野的矛盾，打击日本当局和军部的侵略野心。

美英抓住“济南惨案”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退出了济南和胶济线。6月间，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对中国驻美代表李锦伦表示：“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因此，张学良决定联美抗拒日本对东北易帜的干涉。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去朝鲜旅行，经奉天，张学良派杨宇霆在美国驻奉领事馆与马慕瑞举行会谈，马表示支持东北易帜，之后，美国又派著名记者端纳来做张学良工作（后成为张的顾问），张表示：“满洲是中国的，不会接受日本命令的。”伍朝枢、孙科等访美，张学良于8月28日致电蒋介石，建议伍、孙等在美要宣布东北易帜真象，争取美方支持。蒋复电赞扬张“卓见极佩”，并要伍、孙等照办。日本外相内田到美游说，欲动摇美国支持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决心，结果碰了壁。

7月24日，张致蒋电建议支持日本在野党反对田中内阁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政策。日

本民政党等抓住“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攻击田中内阁搞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处于不利地位。田中内阁处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开始谋求改善中日关系，放松对东北易帜的阻挠，田中最后表示，东北易帜“此为中国的内政问题。”

原系奉军外围的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奉军撤回关外之后，被安置在滦河东昌黎一线，处在奉军和国民革命军白崇禧部之间，成为两军的缓冲。9月中旬，张、褚通电反张学良，班师回奉。蒋令白崇禧部配合张学良奉军平息了张、褚的发难，稳定局势。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有些人对张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不满，蒋解释说：“如果要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北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有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⁷⁾此着不能不说为高明，乃至今日仍有借鉴作用。

张学良特意选择在双十节，在奉天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借以向日本显示力量，和表达追求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以及树立自我的权威。

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赴宁，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代表张群、何成浚商谈，达成四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

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18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这四项协议达成，标志东北易帜的政治结构已定。这个协议，既照顾到东北张学良地方当局的利益，同时，又使东北归属于中国的国家大统一，隶属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蒋介石会见张学良驻南京代表胡若愚时表示，为了不使张为难，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再由中央任命。蒋还应允每月拨军饷一千万元给奉军，无疑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蒋还于12月6日亲笔致信给张，说明此意，盼即行易帜。

经过双方殚精竭虑的努力和惊心动魄的斗争，东北易帜终于瓜熟蒂落。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宣称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⁸⁾是日起，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旗。当日在奉天礼堂举行盛大庆典，各国驻奉天使

节，除日本外，都应邀参加。张学良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派方本仁监誓。张学良发表了讲话，特别强调“举政还给中央，谋求真正的统一。”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大进步，而且在今天仍有重大的警世作用。

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

至此，当时的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大陆各行省、直辖市都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这是从民国以来，中国首次出现的统一局面，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121页。

(2) 刘绍唐：《国民大事日志》1册395-396页。

(3)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86-87页。

(4) 参见《国闻周报》5卷32期。

(5) 1928年8月《国闻周报》、《张学良的东北岁月》135页。

(6) 上海《时报》1928年8月21日。

(7) 上海《时报》1928年10月19日。

(8)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 吴思）

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

● 冯建辉

我曾翻阅多种《词典》、《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竟然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令我大吃一惊。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曾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久，中国也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不应该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50年代的苏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1956年传来令全中国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着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反对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苏联，一位前苏共高级官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对我们这一代苏联人来说，对那些青少年时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战和斯大林个人迷信期间度过的人来说，赫

鲁晓夫的名字和赫鲁晓夫时代意味着什么。你不妨想象一下，千千万万的人汇成人群，面对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说：‘你们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你们自己塑造、你们自己将其扶到高座上的铜偶像而已’。他说毕，就把铁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机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着，他作了如下评论：“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分析和结论是不够的。他谴责了独裁，但未触及专横的权力。他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至于鞭挞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他的霸道性格，这实际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儿水平”。^①

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处处按斯大林的意志行事，脱离本国的实际。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波、匈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要“保卫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实现不该凭借盲目地摹仿外国样板，而应当通过与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途径”，并着手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

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百分之二十四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百分之十四”。意共党的领导人及时总结教训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将继续走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③在美国，“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以后”。美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说：“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④

在中国，同样引起不小的波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要求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纷纷发表评论。如认为“斯大林错误应该从社会制度中去找根源”，“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极大的危险”。“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于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缘故，而民主只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热衷“大民主”，主张“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许多缺点吗？”。甚至有个别党员借口“独立思考”，表示：“党内没有批判马列主义的自由，故只好退出党”。^④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激起千层波浪的这块“石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日渐在毛泽东的心中郁结成一块含义颇为复杂的“赫鲁晓夫情结”。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

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于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作了主调发言，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

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当时毛泽东处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对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如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了反对突出个人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保持艰苦奋斗作风。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于5月20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954年3月17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这里还应该提及张闻天的历史功绩。50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功绩，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二是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毛泽东及时批阅，并认为是个“重要文件”。^⑥1954年4月，中国驻

苏大使馆研究室还整理了《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递了苏联纠正过去对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指出其表现是，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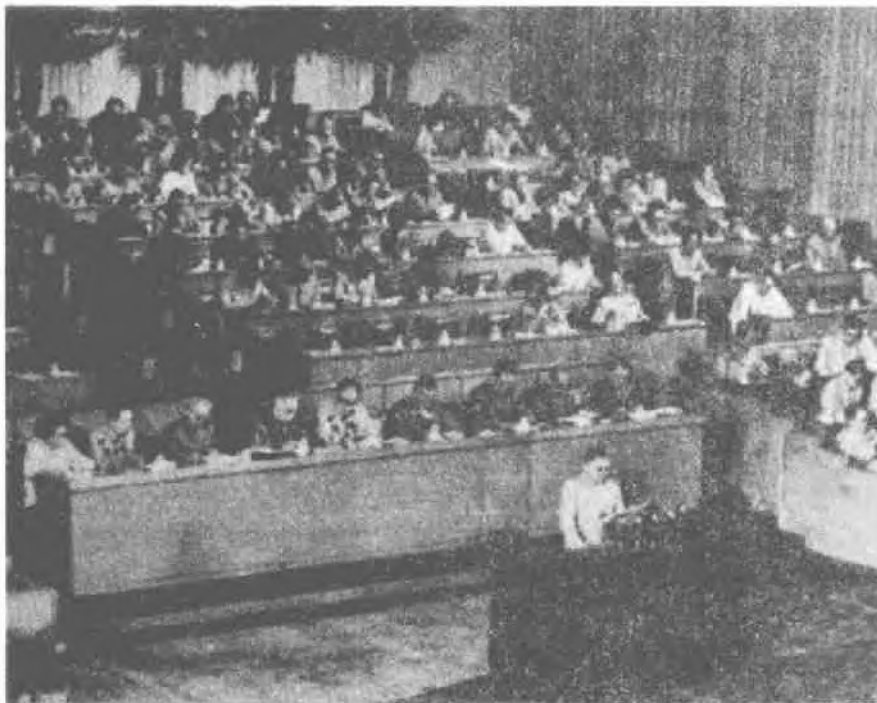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研究，胡乔木谈到毛泽东时讲：“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⑤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有一部分谈“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

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⑥

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还是稳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事使得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重点有了转移。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苏共二十大时，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进一步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提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点明确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斯大林就是搞修正主义；二是东欧出现波匈事件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⑦ 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在论述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时，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对“反对照抄苏联经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口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以“反斯大林”为话题，对党内某些现象提出批评。如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①后来又多次提到，有些人“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甚至激动地说，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中国会不会也“出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话题。毛泽东的这一“赫鲁晓夫情结”症结在于，过分看重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言辞过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批判触及苏联高度集权体制问题的重大意义；只看到赫鲁晓夫是个改革失败者，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过分归罪于赫鲁晓夫个人。

1958年成都会议提出 “两种个人崇拜”

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维护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志讲，毛泽东反对崇拜斯大林，但不反对崇拜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1970年11月16日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毛泽东曾

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但仅此认识不够，我们还要注意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另一段。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欣赏个人崇拜，更重要的是把个人崇拜做为解决矛盾和开展斗争的一种手段。这在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为全党进一步推行个人崇拜，在理论上开了绿灯。其主要内容是：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理论上如此不通的话呢？个人崇拜是一种蒙昧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它把领袖个人神化，强调人民群众对领袖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服从，有什么“正确”可言呢？对待真理，“崇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过去一贯的主张，只有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并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才是正确的。更不能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就否定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不管谁搞独裁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独裁”作为一种制度，早已为历史所否定。我想，只能把这段话作为斗争需要和斗争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会议上听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观点，许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个别人如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中，即使是周恩来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许多干部的这一表态，仅仅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解释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第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没有能正确解决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往往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众监督，以至出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遵循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论述，今天看起来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列宁在这里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这一面，强调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一致性，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党的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站在党之上，领袖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既有一致的一面，也会有矛盾的一面”。⁴⁰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共建党思想和模式的影响，再加上革命和建设取得种种辉煌的胜利，使得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领袖的宣传也出现了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如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时，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的发挥作用；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的形成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这种倾向影响我们党在50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当领袖内部出现矛盾时，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给予解决，而是采取了进一步突出个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办法。

1959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动个人崇拜狂潮的急先锋



1970年毛主席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

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巨大威望和无尚权威，绝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对彭德怀的认识和处理上，也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很妥当。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便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的、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反对个

人崇拜，是“感情问题”（即缺乏或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领袖观点”，“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

上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论，大体上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当时的认识状况。他们确实是出以公心，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来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可惜，认识并不正确。因为把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视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个人的无条件维护，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庐山会议上还有些干部，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来看待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朕即国家”，对待领袖

要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认为这就是“党性”。如有的指责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于这种认识，他指责彭德怀、张闻天：“口口声声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毛泽东同志？”在他看来，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袖错了也不许“不满”，更不许提意见。

在庐山会议上和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的表演，对于全党进一步掀起个人崇拜之风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的同时，别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

规律”。林彪讲的是什么“规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毛泽东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别人只能处于惟命是听的地位，谁要是给英雄提意见，谁就是也想当英雄，我们必须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帝王理论，取代了“无产阶级领袖是个集体”、领袖内部关系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主义。

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1959年11月27日）的学习文件，其中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的部分，问题就很多：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把反对个人崇拜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

——文件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诬蔑”。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胡说的”。这段话显然是歪曲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混淆正常批评与反党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把给领袖提意见的人，“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

军委总政治部的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阴谋家林彪看准风向搞投机，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

拜从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近些年，人们就苏联批判个人崇拜之后中国又相继兴起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作过多方面研究和总结。这是很有益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原因被忽视了，即“权力崇拜”思想的影响，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个人崇拜，是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历史产物，从政治本质上说，就是对个人手中权力的崇拜。一个很长时间内，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在考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片面地强调维护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忽略了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生活，甚至出现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运动群众”的荒唐事情。在这种认识下，领袖做为政党和政权的代表，自然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苏联的垮台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表明，必须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上帝”，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中心位置。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只有老老实实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努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永葆青春，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的理想。

【注释】

①引自【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

②引自【意】托马索·吉利奥：《贝林格》。

③引自【美】佩吉·丹尼斯：《尤金·丹尼斯一生》。

④引自《右派论点选辑》（某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1957年9月）。

⑤引自《六月雪》（牛汉、邓九平主编）。

⑥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

⑦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

⑧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⑨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⑩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⑪引自《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责任编辑 洛松）

一篇《迎春花》 厄运二十年

● 殷毅

1957年春夏之际，先是号召，鼓励鸣放，继而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对于由鸣放而反右，毛泽东曾以谋略家的语言加以概括：叫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但是，在鸣放之初，连中央各大报一把手也无从知晓高层的决策机密，大家都从正面领会“鼓励鸣放”的中央精神，并努力在报道工作中加以贯彻。

这年4月底，我奉命赴沈阳采访，撰写了以报道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为内容的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当时自以为这篇通讯较好地体现了“放”的方针，且被掌管版面的总编室主任将此文在显著地位刊出，证实了我的自我估计不差，曾为之“窃喜”。未曾料到，反右的狂风暴雨骤至，原来被肯定的这篇文章，转眼之间化成了毒草，罪名是“煽风点火”，“为东工机械系右派小集团撑腰”。我这个撰稿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其时《光明日报》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不少人同我一样，掉进了“右派”的泥坑——其中王少桐最后被折腾得自沉乌江，家破人亡。迨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本报除中央点名的储安平之外，错划者全部获得改正，竟然没有发现一名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当年指控我为之撑腰的东工机械系“右派小集团”竟然是子虚乌有。而今回首往事，忆述《第一朵迎春花》背后的故事，虽然时光流逝了四十余年，依然为这场自戕性的悲剧感到分外悲怆。

（一）

1957年春天，共和国洋溢着祥和的气氛。

这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发表两篇重要讲话，一篇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另一篇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前者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个方面的问题，着重提出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者重申“放”的方针，并向与会者打招呼说，共产党准备整风，批评三个主义，希望大家帮助。老人家讲话的那种从容、亲切的语气，宽厚、宽容的精神，令聆听者包括听录音报告者深深感动（按：讲话稿后来公开发表时，作了与原讲话精神不相协调的重大修改）。舆论界闻风而动，各大报开始“放”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现象有所松动。报纸上与“春”关联的词语——“春风”、“春光”、“春暖”、“春雨”等等，一时频频出现。人们真的以为，随着自然界春天的来临，思想上政治上的春天也来临了。

且说当时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引伸出来的一个议题，就是作为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其总编辑宜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而时任总编辑的常芝青却是一位共产党员。党中央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请九三学社成员储安平出任总编辑。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在社长章伯钧陪同下走马上任。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时年48岁。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解放前先后在重庆、上海创办《客观》、《观察》杂志，议论时政。应命来《光明日报》之前，曾担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职务。此人仪表堂堂，举止稳重，谈吐文雅。给我的印象，他是属于那种学有根底、敏于思考、想干一番事业的书生型的文化人。他可能留英时在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教授门下浸润过深，而对无产阶

级专政的学说疏于研习，放言无忌，终于酿成大祸。这是后话。

储安平到职时，各民主党派中央正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讨论毛主席两次重要讲话，京城鸣放气氛日浓。他主政之初，抓了两件事：一是向一百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发出了约稿信。为了表示对作者的尊重，这些信都由他亲自用毛笔书写并签名；二是决定派记者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东北等地九大城市，组织并报道该地民主党的鸣放座谈会。对此，储安平在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讲了话，党中央作了号召，作为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有责任加强有关鸣放的宣传，鼓励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帮助党整风，——“反右”时，此举被指控为派记者到九大城市“放火”，成为储安平的一大罪状。

四月下旬的一天，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老盟员，加入中共不久的新党员）通知我：“领导上决定，派你和王少桐去东北报道民主党的鸣放座谈。”他还客气地问：“有困难吗？”我答：“没有困难。”附带说明，储主政时不设副总编，由总编室主任秉承总编辑的意图，具体组织领导编辑部各部门的工作，其权力颇大。

当时我在总编室从事第二版的编辑工作。长期做内勤，临时变换一下岗位到外面跑跑，也是一种难得的调剂，故而接受这个任务时颇感轻松愉快。

我们订了4月30日去沈阳的火车票。

4月29日傍晚，我突然接到总编室的电话通知：“请于今晚8时到会议室听重要传达。”我准时前去，见会议室听传达的只有总编室主任高天、党派部主任徐亦安和我。原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常芝青传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储安平到职后，常芝青并未调走，只是不参与业务领导，继续负责党的工作）。他在传达前说：“殷毅同志马上就要出差了，听一听这个传达很有必要。”接着他便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是谁？他没有说，但从他传达的讲话的口气，一听就知道这位中央领导位高权重，非同一般，其中一些重要语句，至今印象鲜明：“现在有些党委书记对鸣放思想不通，有阻力，我说了，谁阻碍鸣放就罢谁的官，须知，鸣放好了，了不得；鸣放不好，不得了。”“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可以试试嘛，有什么可怕？有人提出大学党委书记不懂教学，可以叫他们去管伙食嘛。”“中央对‘放’的方针是下了决心的，现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这个方针。”

常芝青是一位资深领导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

《晋绥日报》总编辑，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在他所领导的报社里发表的。他传达中央指示，从来是“一脸严肃”，照本宣科，不作任何评论，这次传达完毕，他只说了一句话：“看来，中央贯彻鸣放的决心很大。”

这里要插一句：凭我当时还计算机灵的头脑，我并没有发现储安平交代的报道任务与常芝青传达的讲话精神之间有什么差异。如果两者不相一致的话，我肯定会听常芝青的，因为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临行前听了这个重要传达，增强了我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加倍努力地完成这次报道任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将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区。

（二）

抵达沈阳后，经民盟辽宁省委协助，商定由民盟省委于5月8日召开一次鸣放座谈会，

在民盟筹备座谈会的间隙，我们探寻新闻线索，把时间有效地利用起来。其时适逢辽宁省政协开会，王少桐前往采访，我则抽空访问了沈阳医学院李佩琳教授。据民盟的同志介绍，李是民盟盟员，国内著名的病理学家，早年留学英国，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他对学术研究中贯彻“双百”方针非常拥护，且敢于直言。鸣放之初，许多人不敢畅所欲言，有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的人，无疑是理想的采访对象。我请民盟的同志代为联系，李教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李佩琳教授住在一座陈旧的日本式小洋房里。小客厅里一张方桌、四把藤椅，陈设极为简朴。我刚一落座，他便面带微笑地说：“闻弦歌而知雅意。”接着，不待提问，他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先自我介绍，说他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一直在医学院校任教。民盟的费孝通教授，他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了。他说，当前窒息学术思想发展的是可怕的教条主义。他举例说，他们学校为学习苏联，硬要把“病理解剖学”分为“病理生理学”和“病理解剖学”两门课来教。他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构造和机能结合起来教比较好，不必照搬苏联的方法。他的观点立即遭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最后还给他扣上一顶“反对领导”的帽子。他笑着说：“这个问题后来总算有了正确的结论，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学习苏联好不好？”当



历经坎坷，作者一九七九年回到报社编辑部

初东北推广苏联费拉托夫的组织疗法，他发现加拿大学者西莱(Seyle)的适应症学说基本内容与组织疗法有类似之处，便建议在研究组织疗法的同时，参考西莱的学说，想不到又受到严厉批判。这样的事例谈了不少，然后话锋一转，谈起该校党委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关心和尊重。他所住的宿舍，地板年久失修，人走上去颤颤悠悠，多次通知学院总务部门，就是不派人来修理。有一天，国务院专家局局长齐燕铭来看他，齐是个大胖子，刚坐上藤椅，不堪承重的地板便突然塌陷，差一点将齐燕铭摔坏。学校闻讯，第二天就派人来修理。他问：“要是齐燕铭不来呢？”他去北京开会，学校派车送站，那司机故意将车停在马路口，要他提着箱子走好长一段路。他说，这哪里谈得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李教授这天兴致极高，侃侃而谈，我只是埋头笔记，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看得出来，他积郁已久，难得有宣泄的机会，今天终于尽情倾吐了。时近中午，我起身告辞，他一定要留我吃便饭，盛情难却，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到住地，我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李佩琳教授访问记寄回报社(刊于《光明日报》5月18日第三版)。

民盟的鸣放座谈会如期举行，12位与会者大部分是高等院校教师，鸣放内容与《光明日报》已见报的大同小异。会后，王少桐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了一则“本报沈阳专电”(刊于《光明日报》5月11日第一版)。座谈

纪要由民盟秘书人员整理，于《光明日报》5月13日第三版整版刊出。

5月9日，报社电报通知王少桐返京，指示吉林省的鸣放报道任务由我去完成。王少桐于10日乘车返京。我正准备去长春，这时东北工学院却爆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新闻。

(三)

5月11日晨，我拿到了上午10时去长春的火车票。在餐厅吃早点时，随手翻阅当天的《辽宁日报》，第二版头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东北工学院82位教师联名上书，要求市委书记焦若愚支持鸣放。”报道说，焦若愚表态支持，10日参加了该校机械系的鸣放座谈会，11日座谈会将继续举行。我立即掂量出这条“鲜活”新闻的分量：大学教师联名上书要求支持鸣放，这是全国首例；而沈阳市委书记表态支持并亲自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无疑对推动沈阳以至整个东北地区高校的鸣放，将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时我想起常芝青传达里的话：“现在有些党委书记对鸣放思想不通，有阻力。”看来东北工学院党委就属于中央领导批评的“思想不通”者，抓住这样的重大新闻，正符合常芝青传达的中央指示的要求。于是当机立断，退掉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在下榻的东北旅社要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南湖的东北工学院。

到达时已是上午九点半，在机械系的一个大教室里，座谈会正在进行，约有一百多名教师围坐在用课桌拼成的正方形会议桌前，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市委书记焦若愚端坐在那里倾听大家的发言，我走进会场，马上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教师走过来悄悄问我是什么单位的，我告诉了他，他转身前去告诉会议主持者。主持者随即请发言者暂停，向大家宣布：“现在有《光明日报》记者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大家鼓掌欢迎！”会场里骤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后了解到，先是该校机械系部分教师要求校党委召开鸣放座谈会，校党委迟迟不予答复，于是部分教师发动签名，上书市委书记焦若愚。与此同时，他们自行推选，组成了十余人的鸣放座谈会主席团，其中有民盟盟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还有中共沈阳市委候补委员、机械系主任王铭勋教授。他们所以迫切地要求鸣放，起因是该校党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历次政治

运动特别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教师，而纠偏善后工作又做得不如人意，故而人们积愤甚深。

我入座后，发言者正接触这一主题。一位教师激动地说：“东北工学院教工共2000人，肃反中受审查批斗的达数百人（具体数字可观，因年深月久，我已不复记忆），最后落实有问题的仅数十人。错打了那么多人，请问焦书记，东工的肃反，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席间不少人齐声附和：“请焦书记回答！”那激愤的氛围，大声的质问，令我隐隐感到教师们有失冷静，但焦若愚却十分沉着，他站起来从容地回答：“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市委已指示东工党委纠正错误，做好善后工作。”他巧妙地回避了所谓“主次”的问题。一位教师提出，该校有一位受审查的教师跳楼自杀，对死者至今没有结论。人们要求党委明白宣布，这位教师是畏罪自杀，还是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教师则声泪俱下地控诉他所受的武斗之苦，他说：“我没有问题可交代，可审查人员硬是认为我不老实，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还有一位教师联系解放前后的遭遇，说他在日伪时期当亡国奴，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而解放后又被人作不可靠分子，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他几乎是痛苦地呼喊：“我们知识分子还有祖国吗？”类似的发言持续不断，一直到下午一点多，还有人要求发言，主持者考虑午饭时间已过，不得不宣布座谈会结束。

像这样意见尖锐、揭露肃反错误的座谈会，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凭我有限的政治经验，知道肃反是个敏感的问题，能不能报道，或报道时应掌握什么分寸，是需要请示的。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备用介绍信，匆匆填好后，趁焦若愚步出会场时，一边递给他一边说：“我想同焦书记谈一谈。”他看了一下介绍信，和颜悦色地说：“这样吧，坐我的车一起回去谈吧。”于是我上了他的轿车，跟他到他的住宅。

焦若愚住在一座小的花园洋房内。到家后，他将我带到设置在地下室的餐厅，厨师送上两大盘热气腾腾的牛肉水饺，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有人跳楼也是事实，市委已两次派人去做善后工作，没有想到老师们的意见还这么大。”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会上有人认为东工肃反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中央对肃反已经做了结论——成绩是主要的。”我问：“这个座谈会可以报道吗？如果可以，要掌握什么分寸？”焦答：“可以报，

但不要涉及肃反。”

焦若愚当时四十岁左右，给我的印象稳重机敏，说话深思熟虑，周详准确。饭后我便告辞，他让司机送我回东北旅社。

当晚我写了千余字的“本报沈阳专电”发回报社（5月12日二版头条刊出）。我考虑，得到市委书记支持的鸣放座谈会，单发一则消息似嫌不足，于是又去东北工学院，找座谈会主席团成员，采访有关背景情况。之后去沈阳农学院、药学院了解教师们对东工鸣放的反应，最后写了一篇2700字的通讯，题目是《沈阳春讯》，遵照焦若愚的指示，文内对肃反一字不提。通讯对东工机械系鸣放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文末引述沈阳其他高校对东工鸣放的反应，说它将引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日风光”。

我在《光明日报》第二任总编辑邵宗汉身边工作多时（任总编室秘书），耳濡目染，渐渐养成凡事多思的习惯。这篇通讯写好以后，我琢磨着，为慎重起见，有必要再写一份情况汇报。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不是惯常的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群众自发地举行，且鸣放的主题是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于是我将有关背景，包括市委书记焦若愚的指示，写了一份详细的汇报，随稿件寄回编辑部。

《沈阳春讯》于1957年5月24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头条地位发表，见报时题目改为《第一朵迎春花——记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前后》。后来知道，此文是我的顶头上司，总编室主任高天亲自编发，标题也是他改的。

（四）

东北工学院鸣放报道结束，我去长春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于5月21日发回千余字的“本报长春专电”（刊于5月22日第一版），旋即返回北京。

到编辑部上班，在院子里碰到资深编辑，有忠厚长者之称的赵西同志（中共党员），他称赞说：“你这次去东北发回的两篇通讯，以《第一朵迎春花》这篇写得好。”他的这个评价，无疑肯定了这篇通讯是较好地体现了当前的报道要求的。

此时京城十分热闹，大鸣大放已处于高潮之中。李维汉部长主持的中央统战部鸣放座谈会正在举行，一批国内知名的高级民主人士纷纷在会上慷慨陈词，各

报刊登的座谈纪要吸引了全国读者的注意。储安平在统战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千字左右的意见，他认为三大主义的根源在于“党天下”，据参加会议的记者说，储安平发言时，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坐在沙发上击节赞叹：“VERY GOOD! VERY GOOD!（非常好！非常好）”储的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光明日报》编辑部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八篇社论！”京城各基层的鸣放如火如荼。据说，北大、清华的大字报，新的覆盖旧的，一层摞一层，围观者络绎不绝，如赶庙会。报社内部，党总支书记张友邀请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在此期间，头脑冷静的人在思考，面对鸣放出来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但并没有人对鸣放提出异议，包括报社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事后得知，正当人们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15日下达了供高级领导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明确指示要准备反击右派，只是对外秘而不宣，以便把更多的“蛇”引出洞来）。

这种状态延续到六月上旬，形势发生了突变。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揭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一度热火朝天的鸣放猛然来了个急刹车。

就在这一天，中央各大报的舆论开始转向。

就在这一天，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一批批地轮番到储安平住所，登门“说理斗争”。据说，闹得储安平24小时不得休息。储被迫辞职，从此不再上班。他成了《光明日报》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编辑——任期只有67天。

就在这一天，成千上万为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而说了一些真话的知识分子，一下子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我没有任何反党的念头，更没有在会上提过什么批评意见，故而读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思想上没有感到压力。虽然对这个急转弯一时理解不了，但相信党中央发动这个运动总是有根据的。其时报社党总支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传达有关反右派的精神和部署，我都照常参加。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飞来横祸正悄悄向我逼近。

（五）

大约在七月份，沈阳高等院校开展反右派斗争，东

北工学院机械系鸣放主席团成员被指控为“右派小集团”，首先被揪了出来。中共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配发了该报记者的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揭发东工这个“右派小集团”如何猖狂向党进攻，并指名道姓地说，“殷毅是储安平的使者”，他“带着储安平的面授机宜”（这位记者抬举了我，按我在编辑部“普通一兵”的地位，尚够不上储安平对我“面授机宜”，他凭空写来，无非要把我同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挂上钩，以加重他所揭问题的“分量”），“参与了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右派鸣放的幕后指挥”。说我写的《第一朵迎春花》为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右派向党进攻鼓劲打气，东工鸣放实际上是“迎春花掩盖下向党进攻的第一枪！”

此文一出，不问青红皂白，我就被揪了出来。比之后来的“文革”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对无辜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报指名揭发无疑要“正规”得多。我有口难辩。

平日和蔼可亲、对我关爱有加的领导同志，此时骤然变了面孔，对我“冷若冰霜”，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态。同事们也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不屑或不敢和我说话了——我这个“右派”就这样被“孤立”了。唯一例外的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夜班编辑宋凉赞，有一天在办公室相遇，他看看四周无人，友好地对我点头微笑。

有生以来第一次沦为批斗对象的我，一时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感到迷惘，感到冤屈，感到愤愤不平。我首先想到焦若愚书记，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自毁诚信？我请示他东工座谈会可否报道，他只要明确表示“不可”，我一定会遵照执行的。他怎么可以许诺在前，加罪于后？——若干年以后，随着阅历长进，我才悟出焦书记的身不由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一员，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上面要他鼓励鸣放，他当然要表态支持；上面要他反击右派，他只能义无反顾地反击。

我又想到我素来崇敬的报社领导人，他们平日分析问题冷静客观，周详严密，何以运动一来，就丧失了判断能力？他们明知我在沈阳的采访，完全符合“依靠地方党委”的不成文规定，并无任何差池，为何会认定我是“右派”？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一文强加给我的罪名，其本身就不合逻辑。东工机械系鸣放座谈会只举行了两天（10日和11日），我是第二天赶去采访的；采访完毕，座谈会也结束了。从时间上推算，纵使我有“参

与幕后指挥”的“狼子野心”，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市委书记表态支持在前，我写通讯报道在后，如果东工鸣放连久经考验的市委书记都没有嗅出其反党的气味，怎么能要求我这个毫无斗争经验的年轻人立时察觉到问题呢？第三，报纸的言论、报道，在政治上把关，从来是领导者的责任（记者应对报道的事实负责），如果我写的通讯确有政治问题，把关者为何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就不必赘述了。

记得为我召开的批判会只举行了两次就完事了。一是我只有“新账”，没有“老账”，要“深入批判”，实在没有多少话好说；二是待揪的“右派”太多，要抓紧时间把该抓的“右派”一个个抓出来。在批判会上，那些一年前在吸收我入党的会议上对我表扬多于批评、满怀革命情谊的同志，此时一如川剧之“变脸”，陡然让我感到陌生起来。他们对我并不存在的“罪行”大肆挞伐。我细细听来，觉得这些发言，与其说表现了对我这个“阶级敌人”的仇恨，不如说显示发言者个人阶级立场的坚定——在阶级斗争的年月，这一条对于干部的荣辱浮沉至关重要。一些平日过从甚密、相互知心的同事，明知我深受冤屈，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此时我才深味古人获罪后那种“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无助和悲凉。当时编辑部只有一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他人仗义执言的，那就是热情正直、心口如一的张天来。郑笑枫被点名批判，他居然跑到整风领导小组去为郑争辩。结果，他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开除党籍、工资降一级的处分。要不是顾念他“红小鬼”出身，戴上“右派”帽子是没有疑问的。

最为尴尬的是参与鸣放报道的记者和报社内部鸣放时提过批评意见者，此时人人自危，担心那高悬的达摩克里斯剑不知何时会落到自己的脑袋上。他们在批判会上如坐针毡，神不守舍，但一种避祸求生的本能，又迫使他们故作镇静，言不由衷地“揭发批判”别人，结果当然是徒劳的。过不了几天，甚至就在第二天，有的人就被揪出来了。事后我常想，人类发明的“政治运动”真是一台怪异的机器，它可以把人的自尊、良知、诚信、道义等处世立身的准则碾得粉碎！

批判会过后，《光明日报》8月4日第三版发表了两篇与我有关的报道。一篇是三版头条四栏大标题：《在本报编辑部职工的追击下，右派分子王少桐、殷毅在沈

‘放火’真相暴露》，另一篇是转载《沈阳日报》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报道中揭发我的“罪行”，就是重复《沈阳日报》通讯所指控的“支持与指挥东工机械系右派向党进攻，并写了歪曲事实恶意中伤的通讯报道”。我至今弄不明白，何以在整个反右期间，向广大读者揭露本报“右派分子”罪行的单篇报道，只发了8月4日这两篇。也就是说，只有我和王少桐有此“幸运”。

我的师长同窗亲朋好友，用不着我写信告知，读后都知道我“出来”了。这真是“十载寒窗无人知，一朝‘身败’天下闻。”

在此前后，去九大城市“放火”的记者，东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钱统纲）两路“全军覆没”，西北组揪出了郑笑枫，只有华东组幸免于难。加上在京采访的记者，以及在报社内部鸣放而获罪者，总数达二十余人，约占编辑部人员的25%。其中有5人被开除公职，交专政机关处理。

（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狂热终于悄然退潮，理性和良知终于又回归到我们这个古老而多难的国度。1979年1月8日，本报政治部所作的《殷毅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对通讯《第一朵迎春花》作了比较公正的结论：

“1957年4、5月间，殷毅同志根据报社编辑部的指示，在沈阳采访，写了《沈阳春讯》的通讯。经报社负责人作了修改，并把标题改为《第一朵迎春花》，于1957年5月24日在本报刊出。

“经查，殷毅同志所写的通讯，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情绪，没有大的错误。

“采写稿件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当时报社负责人的指示办的，是执行中的问题。原结论说殷毅是煽风点火，为右派分子撑腰的说法是不对的。”

错误的结论既被否定，被剥夺了的各项权利随之恢复。1979年6月，我终于回到了睽违已久的编辑部。被错划那年我29岁，回京时已51岁，一生中的黄金年华，在颠沛流离中付诸东流。但比之经受不住北大荒严酷的劳役和饥饿的煎熬、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的难友，我总算侥幸地活了下来。

（责任编辑 杜晋）

王造时“反苏”真相

● 周英才

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连他的姓名权也被剥夺，王造时在死亡报告单上是“1416”。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先生彻底平反，其罪名才被彻底否定。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人之家，14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面对日寇侵华，热血沸腾，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发起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倡导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鼓动民众抗日救国，先后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两个杂志，猛烈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王造时两次被捕，两次坐牢，一次遭暗杀（未遂），多次失业，但他为真理而战斗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解放后，蜚声全国的“七君子”，除邹韬奋于1944年病故和李公朴于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五位“君子”中的四位陆续被召去北京委以重任：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惟王造时一人似乎被遗忘了一般，背着一身在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欠下的债务在上海失业，一家人衣食无着。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由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聘他去担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个安身之所。

“王造时肯定有什么问题，否则不至于如此”，人们一直议论着。有人想到他对《苏日中立条约》的态度。

那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

日本天皇为了苏日各自的利益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

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条约所附的《宣言》中说：“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大为震惊，世界舆论哗然。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之际，苏联不仅要保持“中立”态度，还居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人岂能容忍。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同仁反应强烈，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的部分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炳南、张友渔等人为此而专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但他们与日签订这样的“条约”与“宣言”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全力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大打击，确有公开发表意见的必要。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一份《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初稿拟出后，交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这天除王炳南、张友渔未到会外，其余九人均到会并在信上签了字。解放后，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加强，人们对这封公开信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一位副部长便按照苏联《真理报》的

说法做了解释，强调苏日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同志的“策略”，其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而苏联腹背受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不利的。这样，当时的“公开信”的性质便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的。

王造时受众人之托，作为执笔人，成了“反苏”的祸首。有关方面死死抓住他不放，这个沉重的包袱，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作为特邀列席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组织上对此也很重视。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和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详细地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陈述，29日还找到当时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人共同回顾了这件事的全过程，一致证实，王造时是受众人之托而执笔的，不是他一人所为，即使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大家负责，决不能由王造时先生一人负责。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士的知音。他对王造时的思想包袱早有所闻，但又不完全了解事情的原委，他在日理万机之中，决定找王造时谈谈心。

3月27日下午，周恩来派秘书前往政协招待所接王造时进中南海，并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周总理一

边不停地给王造时夹菜，一边回顾着解放前他们在上海、江西的一些往事，两人谈笑自如，气氛融洽轻松。晚饭后，周总理继续与王造时促膝长谈，仔细地倾听王造时陈述这“不白之冤”。总理设身处地，推心置腹，一面问明某些过程，一面向他作些解释。总理对这场误会表示完全理解，即使错了，归咎于他一个人也是不公平的，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眼睛向前看，大胆地工作。周总理还当面肯定王先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识才华，并说如果王先生同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调到北京来安排工作。

对周恩来总理的知遇之恩，王造时如干旱的禾苗得到一场春雨。他回上海后给总理写信说：“最感动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宽广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望，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

不料王造时返回上海只有两个多月，一场政治运动如急风暴雨袭来，王造时被打成了大右派。自然，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成了使他遭灭顶之灾的“重磅炸弹”。6月22日，王造时再次给周总理写信，以最后一线希望而求助。然而，这封信不管周总理收到没收到，在那种情势下，恐怕他也是无能为力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尽管中苏关系早已恶化，可是，整人专家们为了斗争的需要，再次将“重磅炸弹”抛出，王造时还能说什么呢？（责任编辑 吴思）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图为在狱中高歌的六君子。左起：李公朴、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

澄清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考证上的迷乱

——评潍河一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

● 周 明 沈 达 曹国辉 邢显廷

最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是必然的。但1998年内,十余家报刊先后刊出(或转载)的署名潍河关于河南安阳发现建国前出版的中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五卷本的文章,竟是一篇未经深入调查研究,内容有许多错误的文章。特别是无中生有地把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也说成是主编之一,实属大错。为不使谬种流传,以讹传讹,有澄清事实的必要。

潍河一文突出“发现”二字,说“经过反复考究”,甚至故弄虚玄地自问“这是不是现存最完整的孤本”云云,似乎作者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其实,是把旧事当新闻“炒作”了。

当年晋察冀边区领导人聂荣臻的《回忆录》,刘澜涛的回忆文章,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史》与《人民新闻家邓拓》,党的文献研究专家、学者龚育之、汪裕尧、刘金田、吴晓梅等的著述,以及一些党史专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烽火忆抗战》、《〈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等,都已经明确论述了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尽

管这部《毛选》版权页上当时印的出版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也是属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范畴,而与写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时期”的“民国史”,是有区别的。潍文原题“民国时期出版的”云云,显然不妥。潍河看到的那个五卷本,也不会是“孤本”。当年出版的这部书,在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中和晋察冀老同志手中还有保存。1951年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为人民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写的“出版说明”中,就指出了:“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仅国家图书馆藏的《革命历史文献简目》中,就收录了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5月和1945年3月最早出版的两个版本(五卷本)。

这篇文章中,许多情节是无中生有的。特别是把根本未参与过这项工作的张春桥抬出来,说他是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选》的“编选印刷负责人”之一,更是咄咄怪事!

潍河文章把《晋察冀日报》说成是“由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办”,也是不正确的。《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后改为中央局)的机关报,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聂荣臻对《晋察冀日报》的工作和该报对毛著、毛选的编辑出版,都抓得很紧。1940年,毛主席的《新民

主义论》在延安发表时，在一份复写稿上还有“送晋西北转送五台山彭真同志指正”的批示。彭真收读后交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叫立即排印出版。1944年的《毛泽东选集》，也是分局委托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胡锡奎那个时期对指导报社编辑出版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和《毛选》，是特别重视的。

邓拓从1938年春起主持报社工作，职务是主任。当时报名为《抗敌报》，1940年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时，社主任改称社长。同年5月4日，分局成立党报委员会，以邓拓为书记，一直到1944年。从1938年起，邓拓就把这个报社同时作为出版社，1938年9月开始出版的第一本毛主席著作是《论持久战》。此后，凡有毛主席重要著作发表，晋察冀日报社都出单行本。如1939年出版《论新阶段》，1940年出版《新民主主义》等。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时，邓拓撰写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称“毛泽东主义”是当时的一种提法），经分局书记聂荣臻审阅后发表。同年还选编了毛主席公开发表的五篇重要著作，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所以，1944年由邓拓主编、晋察冀日报社出版这部五卷本《毛泽东选集》，决不是偶然的，是《晋察冀日报》前六年连续出版多本毛泽东著作的发展。潍河文中所述的编辑过程，只字未提分局授意和报社多年出版毛著的事实，似乎是出于偶然，只“是邓拓向报社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建议”。

事实并非如此。这部《毛选》在抗战中的1944年出版，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从1938年开始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以后六年间学习毛著活动大发展的产物，是当时适应边区抗战和整风的需要，也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一大标志。1943年7月，王稼祥、刘少奇等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文，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作出《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1月1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电中强调指出：“建设正确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1月31日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发出《关于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就曾指出在党内外要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分局决定编辑出版这部《毛泽东选集》时，将编选的任务交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将编目呈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由中宣部复电批准后才出版。这是实际的出版过程。

潍河的文章又说：此书是“边编辑边搜集”。这样的说法，似乎没有什么统筹，没有什么主导思想。其实，当时，未按文章写作的先后次序排列，是以革命政纲、统一战线政策、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五个专题分为五卷的。书前有一篇邓拓撰写、经分局审定的《编者的话》，这篇文章是继1942年《晋察冀日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七一”社论之后，又一篇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论述。

至于潍河写张春桥当时任晋察冀日报社“副主任兼副总编”的事，是根本没有的。张春桥是1944年夏才到晋察冀日报社的。是年5月13日有一则报道说：晋察冀分局为加强党报工作，决定由分局宣传部长胡锡奎兼任报社社长。邓拓临时赴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仍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在邓拓未回报社前由张致祥代理。当时这则报道中只字未提张春桥。张致祥和当时编委李荒以及其他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今天还健在，他们都肯定张春桥没有参与编《毛选》，更不是什么“副主任、副总编”。当时组织印刷这部《毛选》的报社印刷二厂厂长周明，现在也还健在，他是在1944年4月由二厂所在地阜平县坡山村去报社所在地阜平县雷堡村接受印《毛选》任务的。邓拓将已经编好的书稿交与周明，对排版、印刷等作了详细交代。邓拓说：“现在书稿已经编出来了，选的这些文章，都是经分局审定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第五卷第一

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现在只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节，是中央宣传部的意思。”当时是4月，张春桥尚未到报社，谈不上他是什么“编选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周明又到报社参加了一次欢迎胡锡奎兼任报社社长、欢送邓拓到党校学习、并欢迎张春桥、罗宗藩等到报社工作的聚会，周明还代表报社职工，作了欢迎欢送的讲话。除周明外，还有当时到会至今健在的其他老同志，都证明张春桥未参与《毛选》编辑工作。

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共出版过三次：1944年5月版是第一版，收入了29篇文章，46万字，分为五卷。实际上5月是付排的时间。6月间将新发表的一篇《与中外记者团谈话》补入。到“七一”报上正式报道出版消息，说明“正付印中”。9月26日又一次报道，说明“初版已售罄、正再版中”。第二版是1945年3月出版，在原版基础上增加了两篇新发表的文章：《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第三版则是把五卷本扩编为六卷本，增加了《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对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线的方针》等七篇文章，全书共38篇，约60万字。这个六卷本，是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出版的，主编人先是中央局宣传部长胡锡奎，胡工作调动后，仍由原五卷本的主编、当时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的邓拓负责，主持完成。那是1945年开始增订，1946年在刚解放的张家口市排版，报社撤回到晋察冀老区腹地阜平后，到1947年3月出版发行的。

1945年3月的版本，到“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大连大众书店开始翻印，1947年冀东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翻印。出版详情，在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史》和《人民新闻家邓拓》两书中，都有切实的记载。当时经手第一部《毛选》印刷的当

事人周明等四人，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为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征文活动，撰写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抗战中诞生》一文，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烽火忆抗战》书中。

1944年晋察冀出版的这部《毛选》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已被各方面公认，不仅在当时发行到晋察冀边区内外，甚至流传到国外。1983年7—11月，日本东京苍苍社出版的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十卷本，即以晋察冀版本为准，对照其他各版本出书的，它被认为是国外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出版《毛泽东选集》权威的版本，足见晋察冀版本在国外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1944年，晋察冀边区军事形势大改观，解放区扩大，开始了对日寇的局部反攻。书报的发行也大大突破几年前的严重困难挫折。而潍河文章却提到：《毛选》“在转送过程中又有一些被日伪军截获、查抄、焚毁”的事。这是想当然，是没有的。

潍文中还写出编选出版这部《毛选》的“负责人还有翟来清”、也非事实。翟来清根本没有参与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更谈不上是“负责人”。翟1944年夏到晋察冀日报社，先在发行科，后来作管理科的（并非报社的）政治指导员，既未参与《毛选》编辑工作，也没有“分工保证印《毛选》的材料供应”。当时供应材料的人邢显廷，今天也还健在，可以证明潍文写的情况不实。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注：这篇评介文章，是编委会周明、沈达、曹国辉、邢显廷写成，经编委会会议同意的。这四位编委，都是55年前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第一部五卷本《毛选》时的直接参加者、当事人。文中写的编辑出版过程和有关主编人的活动，都是真实记录。这篇文章会有助于读者与史学界具体了解《毛选》最早版本的真实出版史）。

（责任编辑 文贤）

丁玲

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 朱鸿召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193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保安的一间大窑洞里，马灯昏暗，气氛热烈。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出席了欢迎丁玲的晚会。丁玲兴奋极了，她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末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末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末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当时的保安城是个小镇，地方不大，住房又少，拥挤得很。主席和副主席也只各住了一间窑洞。丁玲在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总共只住了12天。她与长征到此的成仿吾、李伯钊等人筹备“中国文艺协会”，并于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参加并讲演。共产党机关油印刊物《红色中华》开辟“红中副刊”作为文艺阵地。丁玲在保安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她一一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做客。

“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呀？”毛泽东在同乡故旧面前用更道地的湖南腔问丁玲。

“当红军！”丁玲不无骄傲地回答。只有当红军，才能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只要当红军，就能缩短与眼前人物的距离。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毛泽东也很高兴。

总参谋部在物资供给很困难的情况下，送给她一匹跛足的老马和一个饲养员，还派来一名12岁的勤务兵。丁玲就这样上了陇东前线。不久，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发给丁玲一首欢迎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她

浓眉大眼，秉赋特高；嘴唇含着刚毅倔强，一只丰腴的鼻子遮没了灵气，却沉于心理感受；加上一副壮健的身材，给予她行动冒险的力量。她渴望着燃烧，期待着热烈的生活，敢恨敢爱，恨之以滚滚的浓烟，爱之以七彩的火焰。“世代为官的豪门望族”的高贵，就掩藏在她自信自尊的敢言敢行，敢做敢当，我行我素之中。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象《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后来回忆说：“我虽然缺乏社会经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好争、好斗。‘协会’（著作界抗敌协会，引者注）讨论问题时，我总是要举手发言，发表我们‘左联’的见解，……即使‘协会’的其他成员不同意，我还是坚持己见，他们认为我太厉害了。”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其



红军中的丁玲(1936年冬在陕北)

产党组织联系。在早已预定好的俭德公寓的一间房子里，“进门一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口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这是精神理想的天堂，不是说一般物质世界。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象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



1938年初,任弼时(左)和丁玲在八路军总部驻地

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天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龌龊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

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去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身体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呵!”(丁玲《战斗是享受》)“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丁玲《到前线去》)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时难以转变的欧化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她鼓吹“我们的戏剧歌咏等等,只是一个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而已。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针、是舵。而政治却是战地服务团的指南针、是舵。”她故意在自己的文章中镶嵌些“屎尿”、“他娘的卵用!”(《刊尾随笔》、《广暴纪念在定边》的初刊稿,以后收入《丁玲文集》时都作了“净化”处理。)等卑俗的字眼,以表明自己走近民众,学习民众的决心和勇气。但是当她真正走进了生活,用自己的文笔写下残酷的现实,尤其是残酷现实中的妇女命运,她恍然如见自己的身影。从小说《东村事件》(1937.6.),《新的信念》(1939),到《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她不能平静了,那

种客观写实的笔调掺进了主观抒情。面对眼前那位历经坎坷，备受屈辱的贞贞，丁玲自己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钻出来了。

……我问过她的病，我清楚地现在所承受的烦扰，决不只是肉体上的。……而贞贞呢，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她从没有表示过她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就说是抚慰吧；但我也以为因为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所求于人的样子。

这哪里是在写贞贞，分明是写自己。或许真正的艺术都是用心灵的血与泪写就的，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由转述故事，描写事件的生硬、散乱，到写人物，写心灵，才找到了精神的自我和艺术自我。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终于在女性的心灵律动中，从那黄黑粗糙的皮肤下苏醒过来了。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她坚持认为“群众化”，“不是把我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她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这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的永不退让，永不放松的责任和精神。在战地服务团前后一年多的奔波劳碌中，她开始用个人的事业、生命感觉到岁月蹉跎。“天天搭舞台，天天撤舞台，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们工作了，他们对抗战尽了最后的努力。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代，青春，全付予了这一个村子，那一个村子的夜戏……”（丁玲：《〈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协”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解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动的理性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

知，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1940.），《夜》（1941.）等小说。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象何华明那样工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者对陆萍这个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杂文承担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使命，是“伟大的思想武器”。“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杂文在统一战线中有其积极的责任。“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产[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所以，“我们这时代还须[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丁玲：《我们需要杂文》）

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列学院的文凭头衔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强调生活材料不等于文

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心灵和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正是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从“被重视”的热闹的表面看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被重视才被重视的严峻本质。她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遗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某种恶瘤。锦绣文章中,她“贯注了血泪”,安置了自己“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

丁玲是理性地选择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进延安,出身教养又惠之以韬晦之道。所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不适和矛盾。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

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

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

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她的一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1985年4月,年届八十岁的丁玲重回延安,深藏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思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迸发成灵感的火花。她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

(责任编辑 吴思)

作者更正

一、作者余广人来信说:我写的《“五四”断想》一文,刊登在今年第5期《炎黄春秋》上,其中60页左栏第1行,将今年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错成了“六十周年”,61页右栏倒数第4行又错成为“90”年前,请予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二、吴跃农来电话称:今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马万祺诗中的情怀》一文中说:“并对1999年12月22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第二站——澳门的回归充满信心”(见65页右栏)“22日”应改为“20日”。敬请更正。

三、章学新来电话称:《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一文,最后一节中有一笔误。文中谈到六届五中全会的书记处组成时,错将张闻天、洛甫并列,应将洛甫放在括号内才对。

编者按:三位作者的来函、来电更正,是对个人疏忽的自责,又是向读者表示的负责的交代。这些错误出现在刊物上,虽最初来自作者之手,但编辑、校对、编审未能洞察,同样难辞其咎。愿今后作者、编者共同努力,下大力减少刊物上的错误。

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世界

● 陈扬桂



鲁迅和许广平，是一对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爱侣。但是，在他们相爱之前，鲁迅已经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妻子，许广平也曾经有过一段恋爱经历。

1906年6月，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有时一天之内会收到两封这样的来信，信里说，他母亲病得很重，想见见自己的长子。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人看见他领着妻、儿在东京街头漫步。族人不愿肥水落了别人田，于是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新娘朱安是鲁迅本家叔

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这位媒人平日跟鲁迅的母亲鲁瑞很谈得来，常在鲁瑞面前夸朱安如何如何好，却把朱安当时身材矮小、发育不全的实情给隐瞒了。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俗，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

现在，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倒是族人想到鲁迅是新派人物，怕有一场争斗要发生，或者酿出一场意外的事端来，便摆好架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鲁迅心中自有主张，不管你们怎么说，他总是不动声色地简单作答：“都可以的。”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

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

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当然是跟母亲及朱安生活在一块，但他和朱安之间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仅仅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朱安平日少言寡语，但炒得一手地道的家乡菜。每当鲁迅有客人，她总是以礼相待，泡茶，弄点心，十分尽力。剩下鲁迅和她时，家里就变得冷冷清清，即使同桌吃饭也不声不响，晚上又是各回各的房子里睡觉。鲁迅家里有一只柳条箱，箱底在鲁迅的床下，里面放着他平时换下的需洗的衣服，箱盖则反放在朱安的房里，里面是她为鲁迅洗净晒干的衣服，箱底、箱盖各用一块白布盖着，外人是弄不清其中奥秘的。

提起朱安，鲁迅总是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对朱安，的确是爱也不能，恨也不屑的。但朱安对鲁迅，却既敬佩，又仰慕。鲁迅不跟她说笑，她感到孤独。他们一家住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与邻居的女儿俞芳、俞藻姐妹很谈得来，常和她们开玩笑，叫生肖属猪的俞芳“野猪”，叫生肖属牛的俞藻

“野牛”。鲁迅属蛇，她们叫他“野蛇”。鲁迅非但不生气，还笑着反问：“蛇也有野的吗？”朱安在一旁看到这种亲昵的场面，好羡慕好嫉妒。鲁迅还编了一套体操教小姐妹练习。朱安很自卑，不敢一块练。但是有时鲁迅出去了，她就招呼小姐妹一起学做体操。那时，她40多岁了，一双小脚站不稳当，弯不下去，跳不起来的样子，既好笑又可怜。何苦呢？原来她是出于对鲁迅的敬佩和爱慕，想暗暗努力，缩短和鲁迅的差距。

朱安孝顺老实，尽心孝敬婆婆，直到老夫人寿终正寝。因为包办了长子的婚姻，而使他陷入痛苦的鲁瑞，虽然对儿媳朱安毫无反感，但对造成这桩不幸婚姻本身，老人还是自责的。她对人说：“他俩（鲁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家曾经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包办了这桩婚姻的老人家心里很不安。

和鲁迅一样，许广平同样是畸形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在与鲁迅建立恋爱关系之前，许广平同样经受着包办婚姻的苦痛。所不同的是，她还经历过初恋悲剧的熬煎。许广平生于1898年，她刚生下三天，就被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把她许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许广平长到

十二岁时，就开始向这门亲事挑战。好在时代的进步，她有幸在十八岁时解除了婚约。以后，她又毅然脱离家庭，先后考入天津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彻底摆脱了包办婚姻的牢笼。许广平后来说：“因为我的幸运，所以更加觉得他（指鲁迅）是不幸的，并且对他产生了同情。这大概就是我們共同的反抗旧社会的一致思想，正是有了这个‘一致’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结合在一起。”

但是，在许广平摆脱了包办婚姻的束缚之后，相继而来的一场初恋悲剧又无情地折磨着她。

她的初恋情人是一位名叫李小辉的青年。他的热情、任侠、豪爽、廉洁，摇动了许广平的芳心，点燃了她心中爱的火种。李小辉是广东人，和许广平是表亲，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许广平有一位叫常瑞麟的老同学，家住在北京。那年冬天，常瑞麟的三妹毓麟和四妹应麟患了传染病，许广平象姐姐一样照料着她们。哪知自己也给传染上了。除夕之夜，许广平在参加高师同乐会时，突然感到喉咙阵阵作痛，一时病倒，学校没有空房，只好到常瑞麟家休养。正月初五那天，李小辉一天三次探视她，给她带来西藏青果。许广平病情不断加重，被同学送进同仁医院。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猩红热，经手术治疗，于1924年2月23日才复苏过

来。身体略有好转，她立即打听李小辉的情况，得到的答复却是，李小辉探视她回来后，便染上了猩红热，已于2月11日病故。

李小辉的天亡，给许广平难以承受的打击。18年之后，她还对这段悲怆的往事怀着深沉的感情，她在散文《新年》中这样写道：“到了第18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都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许广平的奶名叫霞姑）的枪痛就像那患骨节酸痛者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是1925年10月确定的，当时，受过鲁迅三年教诲的许广平，作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的总干事，奋战在学生运动的第一线，被反动校长诬为“害群之马”，开除了学籍。鲁迅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激于义愤，挺身而出，为无辜受害的爱国学生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心力交瘁，患了重病。“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使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终于在感情沃土里播种，在革命理想中孕育，在并肩战斗中绽苞吐蕾。这种崇高的爱情，比黄金更宝贵，比白玉更纯洁，比钻石更坚硬。许广平坚定地表示，她将不畏惧世人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

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鲁迅也公开表白：“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压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从表面看来，鲁迅的性格冷静、坚忍，趋于内向；而许广平的性格炽烈、豪爽，趋于外向。其实，在鲁迅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涌腾奔突着的热流；而许广平的性格里面也蕴含着深沉细腻的一面。所以他们爱情的建立，不仅是基于思想的共鸣，理想的一致，而且也是由于气质的相近，性格的契合。正是这样一种坚不可摧的一致性，使得封建婚姻投在他们心上的阴影，终于在爱情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失……

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任教，许广平则就职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十分清苦，但是，比淡而无味的饮食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对心爱之人的思念。同样，许广平也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鲁迅。在这种无奈的思恋和闷人的孤寂中，两人只好让一封封含蓄深蕴的信件作为传情的青鸟，给对方带去珍贵的问候和苦苦的相思。许广平在信中问到“现在手指还抖吗？要看医生不？”并告诉鲁迅“心境一好，无聊自然减少，不会多吸烟”。鲁迅在信中说，为了许广平放心，他身处海滨而不

去洗海水浴。他还开玩笑地告诉许广平，听他讲课的有五位女学生，他“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这些信中，虽然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呻吟，但是，那些看似平淡的语言里却包藏着两颗火一般燃烧着的心。

在鲁迅与许广平恋得难分难舍之时，一位叫高长虹的“文学青年”，却苦苦地单恋着许广平，他想将许广平从鲁迅身边夺走，便以鲁迅学生的名义，打着文学运动的幌子，时常进入他俩的生活圈里。但是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之墙无隙可钻，他终于败下阵来。可恨的是他要小人手段，从背后射来暗箭，中伤他俩，他写了一首《给……》的诗，公开发表在杂志上，诗中有这样几行：“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高长虹在诗中以太阳自比，把许广平比作倚仗太阳之光的月亮，而将鲁迅称为阴冷黑暗的夜。鲁迅知道后，不气不恼，在1929年1月11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是等月亮。”鲁迅还调侃地说：“我是夜，则当然要月亮的”，可见他俩相知之深，相爱之切。

（责任编辑 吴思）

我在黎巴嫩的 “死亡之旅”

● 李同成

1983年7月26日，我奉命赴我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

黎巴嫩是中东的一颗明珠，其首都贝鲁特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贝鲁特不仅是中东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各国的情报中心，各国通讯社共有45家，各类报刊达130多种，它是中东的神经中枢。各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云集这里。对外交官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外交舞台。

可是，当时的黎巴嫩，战乱频仍，在我任职期间，战祸之烈，达到高潮。对他乡异邦的人来说，黎巴嫩之行无异“死亡之旅”。孔子曾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为了我国的外交事业，为了发展中黎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偕夫人雪白毅然衔命踏上征程。

我们乘飞机途经罗马尼亚，做短暂停留，约一个小时，便抵达黎巴嫩上空，临窗鸟瞰，这个面积仅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正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当我们走下飞机，驱车赴大使馆时，沿途所见，使我吃惊。这里到处是残墙断壁，弹痕累累，一座座楼房坍塌在地，道路两旁，堆放着被战火焚毁的汽车。多国维持和平部队，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在各路口巡逻。此情此景，使我想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好像从今日起，又回到了前线。

遍体鳞伤的大使馆

大使馆座落在贝鲁特西区海滨的白沙滩区域，濒临地中海。大使馆是一座十二层大楼，每层分两个单元，前后都有阳台，所有窗户全是推拉式落地大玻璃。房间宽敞明亮，临窗西望，汹涌澎湃的大海，波涛起伏，水天一色，蔚为壮观。

从大楼顶端举目远望，全城景色尽收眼底。

大使馆原为一座豪华的宾馆，是黎巴嫩一位著名设计师设计建造的，由于设计独特，在全市楼房设计评选中，曾荣获大奖。

这座漂亮的大使馆，经过1982年以色列侵略战争的破坏，面目全非，墙壁布满弹痕，所有门窗、玻璃，全部被枪弹和气浪摧毁。战后，大使馆院内到处都是弹片，其重量超过一吨半。

外交部正派出维修队进行整修，估计需一年半的时间才能修复。

凄凉的贝鲁特

贝鲁特是一座得天独厚的漂亮城市，东靠山，西临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在同一时间



李同成摄于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楼顶

登山滑雪，下海游泳。高大的楼房，鳞次栉比，形式各异，全城找不到一座式样相同的建筑物。

从东区山顶向西望，遍山青绿，各式各样高低不同的建筑，散布在丛林之中，黄砖红瓦，宛如万绿丛中硕大无朋、姹紫嫣红的朵朵鲜花。道路迂回曲折，每一曲每一折都好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奇妙而秀丽。置身其中，赏心悦目，犹如飘游在仙境。

经过近 10 年战乱，好端端一座城市，被拦腰截断，东部被基督教势力占领，西部被穆斯林势力占领，双方怒目相视，互相用大炮攻击，每日枪声不绝于耳，全市经常停水停电，电话不通，邮路不畅，往日最繁忙、联结东西区的一座大桥，被称为“死人桥”，再也看不到人迹。不少地区路断人绝，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我驱车行进中，几乎找不出一座完整的楼房，贝鲁特东区最大、最豪华的拿破仑饭店，一夜之间被战火吞噬，远远望去，徒立四壁，所有设施全部化为灰烬。

更可怕的是哈姆拉大街的遭遇。这里本是

寸土寸金之地——全市最繁华的地方，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1980 年黎巴嫩两派在这里摆开了战场，一方提出寸土必守；一方提出寸土必争。两派将现代化武器全部搬来，要在这里决一死战，成千上万吨的炮弹、燃烧弹和各种杀伤武器，在这里狂呼乱叫，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撼整个城市。经过 10 多天的激战，这一商业中心，在一片火海中夷为废墟。

这次残酷的战争，是谁和谁打呢？我询问当地人，他们皱皱眉头说：“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你们为什么要伸出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我接着问。

“亲爱的中国朋友，你问得好！我们也这样问，全黎巴嫩人都这样问。”他看了我一眼，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贝鲁特大爆炸

9 月下旬，黎巴嫩各派武装势力实行停火，贝鲁特出现平静。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呈现一派和平景象。

10 月 23 日（礼拜日）早晨 6 时 30 分，我刚睁开眼睛，准备起床，突然一声巨响，犹如山崩地裂，只觉得楼房摇动，房门被巨大的气浪冲开，两扇落地大玻璃窗砰然崩塌，我简直被惊呆了，只见我夫人脸色苍白，踉踉跄跄从隔壁她的寝舍跑来，她以为我们使馆被炸，向我喊道：“我们的大楼被炸了！”我慌忙穿衣外出，从使馆的南侧向前望去，在滚滚浓烟中，见到在距我馆约一百多米远的法国驻军司令部七层大楼，在一片硝烟中连底坍塌。周围居民的房舍也受到严重破坏，居民们在一片叫喊声中纷纷向外奔逃。

这次大爆炸我馆 90% 的门窗玻璃被气浪摧毁，楼前楼后落满了碎石片。幸好这天是礼拜日，大家起床较晚，没有人外出，无人伤亡，真是万幸。

同时发生爆炸的还有美军司令部的一座四

层大楼。这两次爆炸的时间，相隔只有三分钟。

事后我走访了美国使馆代办皮伍，他向我介绍说：“23日凌晨，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满载烈性炸药，分头驶向美军司令部和法军司令部引爆。美国海军陆战队共241人，除一人正在抢救，其余全部被炸死。法国驻军共58人，无一幸免。”

我正要告辞，他夫人叩门而入，频频向我点头道：“李先生，我们也要走了。”她看了他丈夫一眼，向我说：“他的一位挚友在海军陆战队任营长，爆炸时，被气浪从三楼窗口抛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刚才医院打来电话，说生命垂危，我们要到医院最后看他一眼。”我们并肩走出美国使馆，分别登车而去。

“号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馆从西德订购了一辆奔驰280S小轿车，由使馆两位馆员赵继舜和宋炳林乘飞机赴西德取车。11月14日，他们开车回馆的路上，在黎巴嫩东部叙利亚军队控制区被四名武装分子劫持。我们急忙采取措施寻找，16日上午我约见外交部政治司长，就我汽车被劫持一事提出交涉，请黎方帮助查找。司长说：“对贵馆汽车被劫持一事表示同情和关注，我将立即向有关部门通电话，请他们寻找，俟有消息即向你们通报。”

接着，我又向我驻叙利亚使馆去电报，请他们协助向叙方交涉。

我们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回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杳无音讯。在此以前，各国驻黎使馆数以千计的汽车被劫，光苏联使馆就丢失45辆，至今还未听说有一辆找回。我们要想找回自己的汽车怎么可能呢！

11月21日下午，我正在游泳池旁散步，突然看见罗马尼亚使馆一秘陪同一陌生人向我走来，我赶紧迎上前去，请他们在游泳池旁就座。罗一秘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使馆丢了一辆汽车，是吗？”

“是的。”我答道。

“汽车找到了。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找到的。”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民族社会党的国际部长法雷斯先生，今天我陪同他来就是谈交车的事宜。”

法雷斯先生随即告诉我，何时何地见何人取车。我太兴奋了！将客人送走，我立即向使馆同志说：“我们的汽车找到了！”这时大家正在进餐，一听这消息，情不自禁在喊道：“号外！号外！”

第二天一早，法雷斯派一司机为我们带路。使馆指派我和其它几位馆员到比克法亚地区去取车。

我们一行从西区出发，首先通过“绿线”——这是基督教穆斯林在贝鲁特市中心划定的一条由南而北的中间线。“绿线”附近是危险地带，各派武装力量在自己的据点严密把守，过往车辆都要严格检查。我们声明是中国人，他们才挥手让我们通过。

跨过“绿线”便进入东区，这里属基督教武装力量长枪党控制，一问是中国人，便让我们通过。再向东行驶，进入山区，到达叙利亚军队控制的比克法亚地区，三名武装分子气势汹汹走过来，让我们停车，经过仔细盘问，并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才准许我们继续东行。

我们又越过几道山岭，在黎叙边境接壤处的一座二层小楼前停车，向导告诉我们到了。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一官员正等待我们，看见我们到来，上前迎接，把我们让入会客室，烟茶招待。不久他从门前车库里将车开出，交给我们。我们将随身携带的礼品送给他们，以示谢意。他问我：“你们的汽车内有珍贵物品吗？”

“车内放有一些物品，这无关紧要。牛找到了，鞭子是次要的。”我说着顺手将一份清单交给他。他过目后告诉我：“一旦找到，便会及时告诉你们，请放心。”

我们回到使馆，全体馆员都围拢上来，大家伸手抚摸这辆失而复得的新汽车，颇有喜出望外之感。

中国人修“长城”

12月份，使馆利用战争空隙进行了两项工程。

一是增修地下室

大使馆院落呈长方形，大楼在院子的中心，楼前马路比院子高出一层楼，前院下面是地下室。

1982年战争期间，一颗大型炸弹落在前院，一尺多厚的水泥地面被击穿，炮弹在地下室油库旁爆炸，引起熊熊大火。若引燃油库，整个大楼将夷为平地，由于馆员奋力扑救，才没有使油库爆炸，避免了一场灾难。

为了使馆馆员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决定再增加一层地下室，将使馆的一楼与门前马路修平，成为第一层地下室，原地下室改为第二层。

二是加高围墙。

使馆原来的围墙较低，只有二米多高，而且上半截是栏杆。为防止流弹，决定把围墙加高。

这两项工程由友好人士尼斯梅尔和纳赛尔承包。为了防止工程拖延时间，我们和承包人签订合同，限期完工，拖延一天，扣除1000克郎，提前竣工一天，多加1000克郎。

承包人为了提前完工，两项工程共组织了四十多人，加班加点，昼夜施工。前院后院堆满沙石、水泥和钢筋，车来人往，机声隆隆，工程进展迅速。

有趣的事发生了。大使馆围墙，随地形建造，南面高，北面低，后门一道墙又是东面高，西面低。整个围墙由西向东，再由北向南，一段一段逐渐升高。好奇的黎巴嫩人看见这高高低低的围墙，颇为风趣地说：“中国人修长城了。”由此招引附近一些居民，带着好奇的心情特地跑来观看。

全部工程，按照原定时间，只延长了半天，便全部竣工，我们如数付款。为对他们的紧张劳动表示感谢，特请两项工程的施工人员，品尝中

国饭菜。他们没料到中国大使馆如此尊重他们的劳动，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惊心动魄的春节

1984年2月1日，除夕。全馆同志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晚6时会餐，酒足饭饱之后，开始游艺活动，由俱乐部安排了各种节目，大家兴趣盎然，直到深夜才入睡。

翌日，即我国农历大年初一。贝鲁特东区和南区突然爆发战争，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从广播中得知，穆斯林派的希望运动在叙利亚军队的支援下，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从早晨到晚上，炮声枪声一阵高过一阵，从未停息，正和北京此时的节日鞭炮声遥相呼应。

2月3日，战火由南向北燃烧，就在我们使馆所在的西区沿海一带摆开了战场，枪炮声四起，大街小巷断绝行人。为了大家的安全，使馆决定让馆员晚上都搬到走廊住。

2月4日晚上，双方在使馆附近交战，炮弹在使馆周围爆炸，火光冲天，炮声震地，子弹像雨点一般击中使馆的门窗和墙壁。我们急忙通知大家转入地下室。

地下室地方小，空气不畅通，30多个人挤在一起，很不好受。我们不但注意安全，每天24小时还要从收音机和监视器里观察动静，了解地面情况。

几天，形势发生变化，什叶派首领贝利振臂一呼，政府军中的穆斯林分子纷纷倒戈。政府军在西区失守，向东区撤退，西区又恢复了平静。这时全馆馆员个个疲惫不堪。我们通知大家今晚可搬回宿舍，大家高兴极了。欢呼“西线无战事，今晚风还巢”。

西区的枪声是停止了，未料整个西区变成了“死区”，政府军从东、南和北面封锁，而西部又面临大海，整个供应来源被切断，物价猛涨，抢购成风，整个西区住户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急忙派出采购人员四处“觅食”。好在我们平时略

有储备，短期内尚无断炊之忧，唯恐旷日持久，难以为继。

黎巴嫩的局势正像夏日的气候，阴雨无常。十天之后，政府军宣布停战，解除了对西区的封锁，于是东西区又互相往来了，物畅其流，西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使馆遭炮击

黎巴嫩战乱近10年，大小战争二百多次，十多万人生，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黎各派势力经过无数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到瑞士的洛桑开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洛桑会议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也成为外交官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连日拜访了英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的代办或参赞，交换对洛桑会议的看法。大家都认为前途难卜，未可乐观。

3月23日上午，我访问了萨尔曼先生，此人是前内务部长，其母亲在黎有崇高威望，曾率领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全家都和我们友好。我请他谈谈对洛桑会议的看法。他说：“不要对洛桑会议抱乐观态度，谈谈打打的局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他还向我谈到，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发

生内讧，双方正在摩拳擦掌，战事随时可能爆发。他提醒我，中国大使馆就在导火线上，你们要随时提高警惕。

我向他告辞，驱车返馆。刚走出大门，枪声大作，司机有些紧张，我急忙让他停车，观察动向，发现枪声就在我们要返馆的方向，我让司机调头向北，一直走到海滨，再向西绕到使馆的西部才返回使馆。

约在4时20分左右，果然如萨尔曼所料，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在我使馆周围发生了激战，枪声炮声同时发作，一发发炮弹在我们大楼周围爆炸了，子弹像雨点一般打在墙壁、门窗上。楼下的馆员急速到地下室躲避，楼上的人已来不及，慌忙到楼道或走廊藏身，我刚跑到电梯门口，只听到炮弹片在头顶上呼啸，我赶快就地卧倒。修缮队一工人正坐在桌旁修理收音机，一发炮弹从他耳旁穿墙而过，幸好未爆炸。我夫人雪白尤其危险，当时她正在阅读文件，一颗子弹向她射来，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打穿玻璃，落在她面前，离她的头部不到50厘米。

这次激战，使馆多处中弹，8、9、11三层楼损失最严重，门窗墙壁全部被破坏，特别是第9层，房间内弹皮遍地，无一完物。

当日，我们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内，并请转告家属，使馆人员安然无恙。

25日，外交部再次来电慰问。



李同成(右二)与夫人雪白(左一)拜会穆斯林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库贝西夫妇

贝鲁特大逃亡

政府军在西区失守后，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先后撤走，各派武装力量争先恐后到西区填补“真空”。东区和西区互相开炮，西区各派之间动辄兵戎相见。爆炸、抢劫、暗杀、绑架，每天都在发生。救火车、救护车的警笛声整天呼叫不已，全市人民再次投入恐怖之中，比以往的几次战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3月31日上午，我使馆一官员到约旦使馆办理签证，归途中，在海边遇到三名武装分子，拦路劫车，他急中生智，急速调头逃跑，武装分子向他连连开枪将一后轮击穿，他颠颠簸簸地拚命将车开回。

4月3日，使馆四位馆员到“绿线”西侧一商场购物，刚离开不久，只听一声巨响，商场被汽车炸弹夷为平地。

当日下午，法雷斯派人来馆告我：今晨他的住宅遭炮击，原定明日晚上的宴请活动撤销，请我谅解。

4月10日上午，穆斯林首领沙姆斯丁紧急约见中、美、英、法、苏使馆的代办，就黎巴嫩当局请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延期和扩大治安范围，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予以支持。我的座车由警车开道，并有治安军持枪保卫。美国代办未敢乘坐外交车，也未敢悬挂国旗，乘坐了一辆运货车，由他们自己派出的海军陆战队护送。我们见面之际，美国代办向我摇摇头面带苦笑。当时黎巴嫩的社会秩序难以言状，其他的一切外交活动基本上都停止了。

随着爆炸声和枪炮声，每天不知有多少黎巴嫩平民和外国侨民倒在血泊之中。我国在黎巴嫩唯一的侨民高礼，夜间下班回家，归途中被枪弹击中身亡，年仅三十余岁。

外交官死于战火者，不计其数，就大使来看，继美国大使遇难之后，法国大使被飞弹击中丧生，伊拉克大使随着大使馆一声爆炸，和全馆馆员一起埋葬在瓦砾之中，西班牙大使夫妇正在官邸同亲朋好友共进午餐，一发炮弹在餐桌

旁爆炸，顿时横尸遍地。这一幕幕悲惨的图景，令人不寒而栗。

贝鲁特大逃亡开始了！市民们纷纷离家出走，有亲投亲，有友投友，由于飞机场早已关闭，他们只能从东区的久尼港口乘船到塞浦路斯，再转往其它国家。有的则乘车先去叙利亚，再转其它国家。

各国大使馆、领馆的官员、记者、侨民和家属每天纷纷驱车东去，也是从这两条路线撤离。黎巴嫩的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各国驻黎巴嫩人员撤离的情况。

各国使、领馆撤离时，有的留下一二人看守使馆；有的雇用外籍人守门；有的索性将门上锁而去。

日本使馆撤至塞浦路斯，南斯拉夫使馆的馆员全部回国，行前，这两国的代办曾问我：“你们何时撤离？”我说：“现在尚无此考虑。”他们均疑惑不解。

在贝鲁特这座错综复杂的外交舞台，由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维护中黎友好关系，各党各派，各级政府官员和黎民百姓，对我们都十分友好。我们在黎巴嫩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不论黎形势多么严峻、恐怖，我们都泰然处之。我国的五星红旗始终飘扬在贝鲁特上空。

尾声

1984年7月31日，我奉命转馆。当飞机徐徐腾空，我不由自主地回首临窗眺望，想再看一眼我生活、工作了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城市。我的视线模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地中海的东岸，在颤抖，在呻吟，在哭泣……我的心碎了。

现在黎巴嫩人民已经盼来了和平，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复兴国家。我想不久的将来，中东名城贝鲁特，一定会像火中的凤凰一样，在地中海之滨重新起舞、翱翔，重现往日的丰姿。

（责任编辑 吴思）

无怨无悔的 世纪老人 周骏鸣

● 王晓蕾

在郑州市政肆街省直干休所8楼1号的小院里，今年刚刚度过他人生第96个年头的周骏鸣老人，静静地安坐在轮椅里。和煦的阳光照在他那饱经苍桑的脸上，老人微闭着双眼，似在追忆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生涯中一幕幕非凡的往事。

从少校营长 到红军团长

周骏鸣1902年出生在河南确山石滚河乡一个较为富庶的士绅家庭。他为人正直刚强，青少年时期怜贫惜苦，好打抱不平，尤其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为寻求救国之路，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很快便升到营长，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12月14日，周骏鸣随二十六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董振堂在宁都起义，投入工农红军，在红五军团升任团长。尤其令他高兴的是，在瑞金期间，他有机会与忠厚兄长似的朱德总司令接触，使他懂得了许多的革命道理。

然而，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了。1932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起义的白军军官也不能重用。周骏鸣被资遣回家。对于一个已投身革命的人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失掉组织的信任。在他就要离开红军队伍时，曾忧心忡忡地找过朱总司令。无能为力的总司令只是安慰他，并送他60块银圆作路费。此刻的周骏鸣，不思虑自己的前程，也不担心生命的安危，而是诚挚地问总司令：“我回家去还怎么干革命？”总司令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打土豪，分田地么！”

周骏鸣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不久便秘密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继而组织了农民暴动。斗争实践使周骏鸣进一步认识到，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重要。1933年，他冒着危险同中共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取得联系，参加地下斗争，并很快地加入了共产党，后接任确山县委书记。1934年，他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不久，因省委书记的叛变而被捕入狱。1935年出狱后，任鄂豫边区省委委员。1936年



抗战时期的周骏鸣

1月，遵照省委的决定，他亲手组建并领导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倡议，但对方不但不理睬，反而更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清剿”。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骏鸣肩负着省委的重任，历尽艰险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5月2日，周骏鸣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和朱总司令坐在一起，总司令对他们开展的游击战表示赞叹：“你们真有办法啊，都成了游击专家了！”毛主席特地接见了她，对鄂豫边区省委的工作表示肯定。

随着抗日战争的烽火熊熊燃起，周骏鸣带着党中央“猛烈扩大游击队，建立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返回鄂豫边区，率领红军游击队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使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为了配合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继续扩充部队，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立即将游击队扩编为豫南红军团，周骏鸣任团长。1938年1月，豫南红军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



安度晚年的周骏鸣

支队第八团。3月8日,在团长周骏鸣的率领下,从河南信阳邢集长途跋涉,向皖中抗日前线挺进。

在皖中开展抗日游击战的三个多月中,周骏鸣率团与日军巧妙周旋,并一举消灭了汉奸武装吴可庄大队。叶挺军长来八团视察时,周骏鸣将在肥东店铺战斗缴获的14匹日本战马赠给叶军长。叶军长说:“这些战利品就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说我们‘游而不击’谣言的有力证据。”

半塔保卫战 中的一员骁将

1939年7月,以第八团为基础,新成立了以罗炳辉为司令、郭述申为政委、周骏鸣为副司令、赵启民为参谋长、方毅为政治部主任的第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淮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苏皖边区,以来安县的半塔集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1940年3月初,在蒋介石策划下,华中顽军对淮南苏皖边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形势严重地威胁

着我军的生存和发展。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系顽军,以巩固路西根据地。罗炳辉司令员和陶勇司令员分别率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赶赴路西参战后,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五支队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民、方毅、张劲夫等五位领导与留守后方机关、部队及游击队在路东坚持斗争。3月21日,万余顽军对我路东发起以半塔集为重点的全面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留守部队,占领我路东根据地。21日凌晨,顽军七师从半塔东北方向偷袭我教导大队,因我将士早有迎敌准备,而受挫败走。中午时分,顽军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先抢占了半塔西北制高点,接着将半塔紧紧包围,并以轻重机枪火力封锁半塔和苏鄂间我领导机关的通路,企图全歼我半塔守军。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周骏鸣挺身而出,命令黄一平和他率领的教导大队:“你们守住正面,坚决给我顶住,我带特务二连从光山后面杀上!”说完,他带领二连官兵外加一个新兵排,出其不意地插入顽军的背后,对抢占我半塔西北制高点之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一阵猛烈冲杀,将敌人击溃,我军又重新牢牢地控制了半塔周围所有的制高点,保住了半塔与苏鄂的通路。随后的几天里,在我友邻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终于解除了半塔之围,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半塔七昼夜的光荣任务。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在战后总结中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半塔保卫战的胜利,是苏北胜利的先声。”张云逸断言:“半塔保卫战胜利的意义,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对整个华中的抗日全局也至关重大。”

周骏鸣在革命道路上表现出的坚强意志,赢得了党对他的信任和

重用。1941年,他升任新四军二师参谋长,1945年4月作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战争中,周骏鸣先后任新二师师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无怨无悔知足常乐

1954年10月,周骏鸣脱下军装,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两年后,他当选为“八大”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周骏鸣调任林业部副部长。然而,在这和平建设的年代里,他又经受了新的更大考验。

1959年,周骏鸣因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遭到错误的批判。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贬到黑龙江省任农牧厅副厅长。十年“文革”中,周骏鸣惨遭迫害,被关入监狱长达两年之久。平反后恢复名誉时,已迈入古稀之年的他,在担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不久后便离职休养。这位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有着值得骄傲的战绩,也有着被人误解的难堪,但无论怎样,他都能正确对待,毫无怨言。在他的那些声名显赫的老战友、老部下面前,他从不谈及个人的委屈。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生前听到自己昔日的老战友的境况后,曾亲笔写信,要求有关部门妥善解决周老的生活待遇。直到周老95岁高龄时才坐上配备给自己的专车,他那知足常乐的神情似在对人们说,他对身外之物早已看得很淡,很淡。他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下们说:“我至少能活到一百岁!”不是吗,有所失,才会有所得,我们相信,周骏鸣这棵不老松,一定能迎来他的百年大寿。

(责任编辑 洛松)

当代著名文学家、杰出的杂文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文学部主任聂绀弩，1957年7月30日被文化部当成“右派”揪出来后，坐火车从北京到达黑龙江省的虎林，分配到八五〇农场四分场一队。“八一”建军节这天，这位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人就磨刀霍霍，随大队人马下地割麦子了。因为曾经有人在这儿掏出了一窝狼崽子，所以他在的这个队别名叫“狼窝队”。

后来，生产队看到他人老体弱，没让他下地干重活，安排他经管宿舍，为大伙烧一烧炕。当时气温零下三四十度，曾是高级干部又步履维艰的这位老眼昏花的书呆子，惟恐在田野辛勤劳动的伙伴们，夜间受冻睡不好，就不断添柴，结果炕头过烫，引着被褥起火，竟把宿舍烧掉，被判刑后关进了虎林监狱。

聂绀弩虽然是个文人，但却是军人出身。他1903年1月28日生于湖北京山县。18岁时参加北伐东路讨伐军。之后，到马来西亚任教，又到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任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与徐向前同学。林彪当连长时，他在同一连里任政治指导员。毕业后参加“东征军”，并被留在海陆丰县，协助彭湃同志主办“海陆丰县农民讲习所”。“东征”胜利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绀弩利用副刊《雨花》和《什么诗社》，组织了“文艺青年反日会”，并在报上发表抗日文章和散发反日传单，被反动当局通缉，经上海逃往日本东京。1932年加入“左联”，和胡风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因此被押送回上海。后来，他在上海《中华日报》创办著名的文学副刊《动向》，为

聂绀弩 在北大荒

● 赵国春

左翼作家从事文化斗争提供了重要阵地。他联系了鲁迅、茅盾、丁玲等一批“左联”名作家，自己也经常发表切中时弊的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聂绀弩接受了战斗的洗礼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和丁玲奔向延安。1938年与艾青、田间去山西临汾，准备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但随即被周恩来同志派遣到皖南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他的文章，嘻笑怒骂，挥洒自如，大有鲁迅风骨。

1949年，聂绀弩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开国大典，不久，又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并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到北大荒。

刚进虎林监狱时，狱方为了照顾他身体，不让他参加重体力劳动，叫他给犯人烧炕。他听了婉言谢绝，说：“不能再干了，我正是因为烧炕烧了房子进了班房。如果再让我

烧炕，烧着了房子，又要进班房，可那时班房也烧了，连牢也没得坐了。”

当时蹲在牢里的聂绀弩心里直发毛，他托人给北京的老伴周颖捎了封信。周颖虽然也是个“右派”，但当时还挂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她接到信后匆忙来到北大荒，营救狱中的老聂。农垦局党组织听了全国政协委员周颖的申诉，相信革命几十年的聂绀弩虽在政治上定为右派，却还不至于去做放火犯。他们冒着承担“包庇右派兼纵火犯”的风险，将聂绀弩放出来，并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

聂绀弩干瘦，高个，好抽烟，沉默寡言，性子倔犟而又诙谐。整天坐在案前，抽烟喝茶，伏案看稿。

有一次，大伙谈到他因为烧炕起火进了班房的事。七嘴八舌，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又坐过共产党的牢，不觉感慨万千。聂老听了幽默地说：“还是共产党的好！”大伙不解地问：“为

啥”？他笑吟吟地讲：“我刚进虎林监狱那阵，正赶上新年、春节一起过，每人发一百个冻饺子，作为两个节日的伙食改善。我年老体衰，饭量很小，这一百个饺子连续改善了我好几天伙食，所以嘛，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好。”

聂绀弩被打成“右派”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的位置上，下放到北大荒，他虽然落魄了，但他精神未垮，在编辑部仍然一丝不苟地工作。当年一起同他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过的老作家丁继松在回忆中写道：

“一次，一位农场青年作者送来一篇小说稿。聂老看完后问这位作者：‘济南有个豹突泉么？’作者一时愣住了未答上来。原来这篇小说中提到了济南城内著名的趵突泉，但却将‘趵’误写成‘豹’。聂老当即严肃地指出：‘拿不准的词、字，应该查一查，要养成写作上的严谨作风’。这位作者深受感动，40年后仍记住此事。”

聂绀弩在北大荒的年代，正是我国“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艰苦。这位五十多岁的著名作家，和大家一样吃九元钱一个月伙食的大食堂，“三月不知肉味”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正是北大荒的深秋季节，满山红叶，秋江鱼肥，北大荒画报社的同志从乌苏里江搞到几条大马哈鱼。当晚画家用脸盆炖了一大盆，并把《北大荒文艺》编辑部的编辑们请去参加鱼宴。那时能吃到名贵的大马哈鱼不啻是上了国宴。聂绀弩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这次鱼宴中还有一位大画家在座，他就是尹瘦石。酒过三巡后，聂老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

口中淡出鸟来无，
寒夜壶浆马哈鱼。

旨酒能尝斯醉矣，
佳鱼信美况饕乎。
早知画报人慷慨，
加以荒原境特殊。
君且重干一杯酒，
我将全扫此盆余。

聂老当时已57岁，眼力不济，在十几双筷子的袭击下，装鱼的脸盆已渐渐露底，因而诗中有“我将全扫此盆余”之句。此诗后来收入《散宜生诗集》

聂绀弩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时，编辑部人才济济，编稿的有杨防、林子、钟涛、王忠瑜、萧英俊等；美术插图有王观泉；画版样及漫画的是丁聪，题字有黄苗子。聂绀弩以“待罪之身”，在《北大荒文艺》工作，和过去与鲁迅等一起办《动向》、《海燕》以及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时不同，只有参谋、建议权，无发稿权。有一次，在来稿中他突然发现张惟（后来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龙岩文化局局长）写的小说《第一书记》，颇有新意，文笔优美，便建议刊登。谁知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围攻、批判。批判张惟时，聂老不仅不发言，还愤然不平地写诗赞道：

《第一书记上马记》，
绝世文章惹大波，
开会百回批掉了，
发言一句可听么？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北大荒人谁最健？
张惟豪气壮山河。

张惟后来回垦区访问时，专门谈到此事，赞聂老一身铁骨，威武不屈，大声背诵此诗，引为生平一大光荣。

至今，许多老同志还赞扬聂老

当年那种威武不屈的正义感。

聂绀弩就在编辑部，这座虎林郊外日本鬼子当年扔下的冷屋里杯酒作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写下了真实反映北疆黑土地的原始风貌，豪放浓郁的古绝唱——《北大荒歌》。在北大荒生活期间，他还写了五十多首以北大荒生活、劳动为题材的格律诗，有《题丁聪画老头上工图》、《归途》、《拾穗同祖光》等。

聂绀弩年轻时好围棋，进监狱后想与狱友下棋解闷，然而牢房里是不会备有围棋的。聂老出主意，让几位狱友把省下的米饭留下来，捏成体积大小如棋子的许许多多小饭团，再把其中一半染上墨水，一副围棋便成了。

“文革”中，因他发表不满林彪、江青的言论而以“现行反革命”之罪被捕。送往山西第三监狱，先判死刑，又改无期徒刑。直到1976年3月17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1980年他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著作甚多，从抗战开始，先后出版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杂文集》等27种。

聂绀弩1986年3月26日逝世后，新华社发出讣告，称他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老战士，杰出的文学家、诗人、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革命的社会批评家。并称他为继鲁迅逝世后，我国最杰出的杂文家。

为纪念这位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京山县政府设立了聂绀弩文艺创作奖励基金，将位于绀弩故居附近的一所中学更名为“绀弩中学”。绀弩公园、聂绀弩著作陈列馆等系列工程也开始筹建。

（责任编辑 文贤）

欧阳予倩在台北演话剧

——回忆二·二八前夕的一幕

● 吴克泰

1947年2月初，欧阳予倩先生率领上海新中国剧社数十名团员来台北演出。台湾文艺界及广大文艺爱好者，如久旱遇甘霖异常兴奋。关于他的传说不胫而走，有的说欧阳先生曾是京剧名旦之一，后来改行致力于话剧事业；有的说欧阳先生曾到日本东京专演进步话剧的筑地小剧场进修过；有的说：欧阳先生抗战期间带领剧团巡回进行救亡演出，一次翻车受了重伤。大概是台湾戏剧界同仁大都有过辛酸经历的缘故，对既是中国话剧界泰斗，又有着曲折的艺术生涯的欧阳予倩的来临，寄与了更多的关爱，更大的希望。

谈起台湾的戏剧，一幕幕幼时的记忆浮现眼前。我上小学时一度住在台湾东北部罗东镇上，偶尔父母或亲戚带我到剧场去看戏。有时是“大戏”，那是一种类似京剧的古装戏，台词用的是闽南文言；有时是“歌仔戏”，类似闽南的芗剧，以唱为主，音乐和唱腔都很优美动听，台词和唱词都用闽南语，主要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陈三五娘》等。

我们家搬回农村后，逢年过节村里都要请戏班子来，或演大戏，或演歌仔戏，有时也演傀儡戏或布袋戏。每次戏台前都挤满了观众，就像

鲁迅在《社戏》里描绘的那样。有一年的中秋，乡里关帝庙前筑起了两个戏台，两个戏班子都演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互相比赛。小朋友们说，演员演得入了神，真得会把人头砍下来，所以我们看戏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当然，这都是杞人忧天了。记得我还在罗东镇上小学二年级那年的冬天，从台北来了一个京剧团要演《岳飞全传》。我大伯是个普通佃农，不识几个字，喜欢看京戏，于是便从几十里外的三星乡下老家赶来看。他一再对我讲：“这是‘正音’戏，和别的戏是不一样的。”

伯父所说的“正音”，按我的理解就是“国语”，就是大陆同胞说的“官话”。伯父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总带着几分神圣。

京剧《岳飞全传》在罗东座剧场足足演了一个月。因小孩免票，我大伯每天晚上都带我去看。我虽然听不懂对白、台词和唱词，但因为是从头看到尾，故事情节还大体上弄清楚了。那优美的动作、台词，变化多样的唱腔，特别是从幕后先唱几句边唱边走出前台的悲壮的腔调（回大陆后才听说这叫倒板）完全把我迷住了。岳飞和岳飞全家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及他们的壮烈牺牲，深深地打动了幼小的心灵。

抗战开始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非“皇民化”的台湾本地戏剧逐渐被取代了。

台湾在日据时代就有使用闽南语言的话剧。据说在抗战前也曾经演出过一些进步的、反日内容的话剧,例如以《鸡笼》为名的短剧,比喻台湾人民好像被关在日本人笼子里的鸡一样,没有自由,要求解放,但这些进步话剧先后被日本统治者扼杀在摇篮里。当时有一位叫宋非我的演员,曾经在日本东京筑地小剧场受过训练,学习过苏联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理论体系,勤学苦练,成了台湾著名的话剧演员。据宋非我说,1943年2月以简国贤为首的桃园双叶会在台北市最大的公会堂(现称中山堂)演出了简国贤创作的反映高山族同胞抗日斗争内容的《阿里山》,对抗皇民奉公会的戏剧活动。

台湾光复后,许多戏班子恢复了。逢年过节演大戏,歌仔戏(南部还有高甲戏)的习惯也恢复了。但当时台湾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也不予扶助,不少戏班子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解散。

光复后,台湾的话剧界也想重整旗鼓,有些热心的话剧爱好者如台北山水亭老板王井泉先生尽了很大力量,仍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1946年6月9日至13日,以宋非我、简国贤为中心网罗了当时台北文坛著名人士江金章、王井泉、张文环等人的“圣烽演剧研究会”,经过一段的筹备,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了简国贤创作的话剧《壁》和《罗汉赴会》。《壁》的舞台布置主要是一堵墙,演员在墙的两边各演各的。一边是官商勾结、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另一边是穷困潦倒的失业工人。这出戏把台湾社会的现实加以形象化艺术化,活生生地搬到舞台上,最后宋非我扮演的失业工人服毒自杀,挣扎之余,要用头去撞倒那堵墙……观众看了异常兴奋,连连叫好,热烈鼓掌。个别站在国民党立场的观众则认为不好,同周围的观众争吵起来,演出了“全武

行”。台上演假戏,台下演真戏,可见这出戏揭露社会现实的深刻程度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被称为台湾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的王白渊先生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台湾戏剧文化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这出戏连演了五天,场场爆满,根据市民要求,准备演第二轮。但是,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下令禁演。《壁》真的碰壁了。台湾的话剧运动又一次受到重大挫折。

到了秋天,台北市成立了外勤记者联谊会。为了筹集经费,以年轻的外省籍记者为主,在中山堂演了曹禺的《雷雨》。年轻的记者们都没有受过演技的正规训练,但演得很认真卖力,因而博得好评。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台湾话剧界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进入1947年,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进一步影响到台湾,政治腐败、经济危机、社会不安,使人们郁闷得透不过气来。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予倩先生率领新中国剧社来台北演出,给台湾吹进了清新的空气,因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台湾文化协进会举行茶话会欢迎欧阳先生和新中国剧社一行。该会会长游弥坚(由重庆回去的台湾人,时任台北市长)致欢迎词,表示希望剧团的来临有助于推进台湾戏剧运动的发展,并对普及普通话做出贡献。

新中国剧社连续在台北中山堂演出了《雷雨》、《日出》、《万世师表》、《牛郎织女》等优秀剧目,获得了很大成功。演出水平相当高,我场场必看,大饱眼福。

演出之前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欧阳先生此行不仅是为了演出,而且想同台湾话剧界交朋友,有意推动台湾话剧运动,你是本省籍记者,在台湾话剧界又有朋友,到欧阳先生住处出人也方便,请你协助他一下,当个联络员吧。”于是,我联系了台湾话剧界的宋非我等人,约好在一位戏剧家家里举行宴会欢迎欧阳先生。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去台北车站对过的旅馆带着欧阳先生前往大稻埕永乐(现名迪化街)赴宴。主人方面摆了好几桌宴席,热烈欢迎这位中

国话剧界的老前辈。当时，主人方面都还不太会讲普通话，欧阳先生就用日语同他们交谈，气氛非常融洽，亲如一家。欧阳先生在这里遇到筑地小剧场的后辈宋非我，特别高兴。在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台湾也有一位姓欧阳的话剧老前辈，名剑忞，因演进步、反日的话剧被捕入狱。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终于在光复前惨死在狱中。设宴的地方正是欧阳剑忞先生的家。欧阳予倩先生听了，肃然起敬，对剑忞先生没有能够见到台湾光复表示非常惋惜。欧阳先生问主人方面：你们在日据时期演过什么戏？据答，当时台湾除演自编的戏以外，还演过祖国大陆的进步剧目，其中包括欧阳先生的《万世师表》等。欧阳先生听了又惊讶又高兴，请主人把这些历史资料送给他，以便带回上海发表。接着欧阳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赞扬了台湾戏剧界在艰苦岁月里的奋斗。他强调，法西斯（暗指国民党）最坏，我们一定要反对，但要讲究方法和策略，必要时可以借古讽今。他还说，如果剧本通不过，就请找白克（来自大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人民导报》创办时的同仁，当时任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听说多年前在台湾失踪）。几天以后，我把欧阳剑忞先生的公子送来的用美浓薄纸复写的《台湾话剧运动史》交给了欧阳先生。

这部史料是已故欧阳剑忞烈士的遗作。我去时，欧阳先生正耐心地教新中国剧社社长（姓名已忘）唱一种调子，听起来很和谐，但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后来我来到大陆，看昆曲时才想起当时他们唱的就是昆曲）。

2月27日晚上，我同欧阳先生约好，带延平学院学生叶纪东和蓝明谷（已在台湾牺牲）去，向他请教如何组织和开展学生界的戏剧活动。欧阳先生亲切地一一给他们指点。

谈话结束，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从欧阳先生下榻的旅馆出来，在回报馆编辑部的路上，就遇上了一大批群众，正往警察局方向跑。一问才知道，专卖局缉私人员抢走了小烟贩的香烟

和现款，打昏了烟贩老嫗，还开枪打死了人，群众不答应，正在追捕凶手。群众包围了警察局，后来又包围了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这天夜里天气相当冷，又下着蒙蒙细雨，但群众一直坚持到天亮。我在中间赶回报馆同周青合写了一篇详细报道，发稿后又赶回现场同群众一起坚持到天亮。拂晓时发现警察大队向群众反包围过来，群众被迫散开。

群众散开以后自发地动员更多的群众起来示威游行。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大爆发了。坐着小汽车的国民党贪官污吏都受到了惩罚，也有外籍的一般中小公务员被误打。我忙于参加斗争来不及去照顾欧阳先生一行。虽然误打外省人的现象很快纠正过来了，我一直担心着欧阳先生一行的安全。听说在混乱中有一批群众去旅馆要找外省人算账。欧阳先生从容不迫地走出来，用日语（当时一般群众还不会普通话）向群众发表演说。他说，国民党贪官污吏欺压你们，你们就起来同他们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是来演戏的，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们的斗争。

台北的“二·二八”斗争持续到3月8日。当晚国民党的援兵开进台北即对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台湾全岛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欧阳先生一行到全岛巡回演出的计划夭折了，不得不于3月下旬返回上海。

我也被通缉，于同年4月15日到了上海。我去拜访欧阳先生，彼此重逢，互道珍重。他还邀请我去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一个很别致的小剧场里，看了该团演出《大雷雨》。

1949年春，我从台湾来到北京，后听田汉先生说，欧阳先生在中央戏剧学院任院长，我还到他住的铁狮子胡同，再一次拜访了他。

欧阳予倩先生已辞世多年了，想起台湾“二·二八”事件，想起在台湾看戏，我都回想起他。

（责任编辑 洛松）

我在加拿大打官司

● [加拿大] 赵金娥 口述 何甜 整理

《炎黄春秋》编辑先生：

寄去稿件一份。它叙述了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反映了加拿大华人劳工阶级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法律上）我是一个十足的“睁眼瞎”，没有请律师便向加拿大联邦法院发起挑战，居然可以推翻该院的判决，赢得了一场小小的官司。这件事体现了这个社会有平等、宽容和讲道理的一面。我乐意将它与国内的读者分享。因为我们水平有限，写得不好之处请尽管删改。若能发表，稿费请代捐给希望工程。不用收据，我相信你们。

我们全家除小女儿不识中文外，全都是贵刊的忠实读者。祝贵刊越办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祝中国人民自由、幸福。

敬礼

赵金娥 口述 何甜 整理

1999年4月26日

“因此，本法庭于1997年1月7日的判决，应予撤销……”

“阿女啊，你再看仔细点，有没有搞错啊？”虽然大女儿已经读高中了，在学校里年年都得奖学金，但我还是不太放心，不是说，联邦法院的判决就是最后判决，是不能推翻的么？

“哎呀妈，这里说得清清楚楚的：revoke，就是撤销。下面还说，你的这宗案子要从新审理呢。”

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还能不信？我松了一口气。看来，联邦法庭的判决，也不是什么板上钉钉的事儿，还是可以推翻的。

其实原来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我在移民加拿大四年之后，就有资格申请加入加拿大国籍，但必须通过测验英文和关于加拿大的常识。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终于决心去试一试。结果是不及格，据此多伦多入籍法庭否决了我的申请。通知书说，我可以有两种选择：重新报

名再考，或是向联邦法院上诉。对于重新再考，我实在没有信心。我的“最高学历”只是在中国乡下读了四年小学，那是人人胸前戴毛主席像章的时候，学大寨学得连粥都喝不起。父亲说：“女孩子家，读什么书，回来干活吧。”就这样我眼巴巴地离开了学校、老师、同学和书包。十三岁我就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动力了。刚刚来加拿大时，连英文“A”字就是“一个”的意思都不懂。生活负担又那么重；又要买房子，又生了孩子。我在酒楼洗过碗，推过点心车，最后在一家时装厂找到一份车衣服的工作，做到今天也好多年了。从来没有时间去读英文。那天试卷发下来，上面说的什么我都看不懂，不及格其实并不冤枉。再去考多几次大概也是不及格。再说，报名费要二百加元，相当于我两天半的工资了。既然上诉不用花钱，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叫女儿按着通知书上说的办法，写了一封信去渥太华的联邦法院，请求他们寄一份上

诉申请表来。没想到，一等就是两个多月，才收到一份姗姗来迟的表格和一份注意事项，说是必须在多伦多法庭否决我的申请的六十天内填好表格上诉才有效。我想这加拿大的官僚主义也真够可以的，寄一份表格要两个多月，却要别人在两个月内上诉，就是坐火箭也来不及啊。不过既然表格也寄来了，我也不管它什么期限，照样叫女儿帮我填好了，当天便寄出去。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等来了联邦法院 1997 年 1 月 7 日的判决书，里面说由于我的上诉超过了法律所要求的六十天内的期限，所以上诉无效。接到这份糊涂判决，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和我的老公商量之后，决定去找我们选区的国会议员帮忙。

议员办公室的一位华裔助理把法院给我们的几份通知和判决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用为难的口气说：“你这宗案子不好办。这是联邦法院的裁决。它是全国最高一级的法院，没有上诉的可能性了。议员办公室也帮不到忙。”

“但是这个判决一点也不合理，是不是？”我追问。

他又沉吟了半天：“这样吧，你们找个律师帮忙……”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坐在一旁一直不吭气的老公突然冒出一句。

助理吓了一跳，忙不迭地解释：“我没有得罪你们吧？实在是帮不上忙……”

老公还想发作，我扯着他的衣袖把他硬拖了出来。他余怒未息：“丢那妈，我们交了那么多税养肥这班契弟（注：广东话，混蛋的意思），懒得要死。下次竞选再到我们家拉票，门都不开给他！”

快快地回到家里，越想越不是味：既然是联邦法院，那就是“御状”了，更应该讲道理的啊。我总不该糊糊涂涂地输了这场窝囊官司吧，人家秋菊挺着大肚子还翻山越岭去讨个说法哩。可我们这些穷光蛋又请不起律师，怎么办呢？老公说，找间报社请记者把这件事登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出他一口鸟气也好。我觉得那样反把事情弄僵了，不如先写封信去联邦法院讨个说法，若还不成交找报社不迟。主意打定，吩咐大女儿

起草了一封信给联邦法院办公室：

“敬启者：

1997 年 1 月 7 日贵法庭对我上诉的判决书已经收到了。该判决认为我的上诉已经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 60 天限期，所以上诉无效。

我感到非常困惑。既然如您的信中所示，贵办公室花了 65 天才寄出上诉申请表给我，那末，请问我怎样才能能在 60 天内上诉呢？

请您给予指示，谢谢。”

大家斟酌之后，觉得写得明白扼要，不卑不亢，“绵里藏针”。女儿在学校是学会电脑的。我们也买有一部平价电脑给她，这下派上用场了，很快便把这封信打好寄出。

又过了足足三个月，终于收到联邦法庭的第二封裁决书，撤销了那个糊涂判决。也就是女儿在本文开头给我念的这一封。老公放工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既然要上庭了，你还是要多少去读点英文才行。咱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打这场官司。

于是我去唐人街的社区周末免费入籍辅导班报名入了学。失学了二十多年又再捧起书本，觉得又是新鲜又是困难，我读得十分认真。平时放工回家，也仔细温习功课。连刚上小学的小女儿，也成了我的辅导老师，这可真是“不耻下问”了。懂多了好多事情：加拿大国土比中国还大，但人口却比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还少；温哥华的三文鱼举世闻名；加拿大第一任总理名叫麦当劳，这好记，几个孩子都喜欢上这间快餐店；爱德华王子岛（注：加拿大的一个省份，位于大西洋）盛产龙虾和土豆。那个暑假我们全家还浩浩荡荡开到东海岸四省旅游了两个星期，孩子们十分喜欢那里麦当劳快餐馆的龙虾肉汉堡包。

10 月 9 日是上诉聆讯的日子。老公特意请了半天假陪我去上庭。离开庭还有二十分钟，我们就到达了。推门一看，这联邦法庭好大呀，有二十多排旁听席，空荡荡的。法官的位置高高在上，正面墙上挂着女皇像，旁边是加拿大国旗。法官还未入席。书记官的位子上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年青美女，正和一个穿黑袍的高个子说着话。这个高个子肯定比穆铁柱矮不了多少。看

着我们两个乡巴佬探头探脑地进去，那女书记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问我的名字，又核对了我的证件，告诉我先坐一会，马上就要开庭了。她又指着前面一个木栏杆的四方架，里面有张椅子，说等会开庭后要我站在里面手按圣经起誓，问我这样做会不会和我的信仰相冲突。我看着那个四方架，心里怦怦直跳。我知道那叫证人席，香港电影《法外情》里面，戴着假发的刘德华就是盘问坐在里面的证人的。

这时那高个子也正和我老公谈得投机。他自我介绍他是今天的 *amicus curiae*（注：法庭请来作证的中立专家），等一会就是他来考查我的英文和关于加拿大的知识。我老公也告诉他，我因为孩子小又要做工，所以学习的时间有限，有些紧张。他安慰说不用害怕，他问的都是简单的问题，慢慢想清楚了再回答。正谈着，走进来一个板着脸孔的法警，宣布各就各位，然后起立。法官入席，大家坐下。这法官年纪大了，胖胖的，秃顶，慈眉善眼，笑咪咪的。怪不得在加拿大杀人放火都只判几年徒刑，像这个弥勒佛般的老法官一定不忍心判人重刑的，我今天算明白了。

等我站上证人席宣誓之后，高个子便站起来向我发问。先问我的名字，来加拿大多久了，在什么工厂工作，住哪里，有几个孩子，都在哪里读书等等。这些我都懂得，但由于心慌，答得结结巴巴的，声音像蚊子叫。这时法官便说可以让我的老公（他是那二十几排旁听席上唯一的听众）站在我的后面为我壮胆，但不能帮我回答问题。这使我镇定了不少。接着高个子又让我从一数到十。这太容易，我朗声读出：“wang , two , flea , four , fai , sex , sebun , ai , nai , tin ! ”

我觉得这是我回答得最满意的问题。当我数到“六”的时候，我看到女书记高兴地笑了。（注，作者因为英文水平有限，发音也不准，错误很多。“六”字英文是 *six*，作者读成 *sex*，是性交的意思。类似错误下面还有许多，如将魁北克省和它的省会魁北克市混淆；又如将“选举” *vote* 读成 *boat*，是小船的意思）。以后高个子又问我关于加拿大的常识：首都在哪里，哪一天是国庆节，现任总理叫什么名字等。他又叫我说出加拿

大最大的两个省的名字，我回答：

“Ontario, and Quebec City。”

这时法官插话，说根据他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答得不错。”我感激地望了他一眼，信心更足了。

高个子说，他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了：假如你入了籍，你就成为加拿大公民了。那么，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

我一下子就懵了。在课堂上，老师把《权利和自由宪章》反复讲了好多次，并且强调十分重要的。可我从未弄清楚过，那些英文名词在我的脑子里是一团浆糊。事到如今，我只有硬着头皮试试运气了：“言论自由”我怯生生地回答。高个子回答说，言论自由是所有一切人的权利，而不是只有成为公民后才有的权利。我开始慌了，苦苦地思索：“可以领加拿大护照”。高个子又解释说：领护照是公民的一个权利，但不是最重要的权利。“十八岁以后才享有的”，他提示。

就这都领到门边了，可我还是没开窍。我没主意了，法庭里静了下来，大家都望着我。老公眼看要坏事，也急了，小声地在后面用中国话提示：“选举。”

我的天，怎么就忘了呢，我赶紧喊出：“boat ! ”

“vote,”高个子纠正“very good ! ”

提问到此结束。高个子总结发言，大意是说，虽然我的英文和关于加拿大的常识不是很好，但是还是足够适应在加拿大生活的需要，以后还必须学习，等等，接着老法官即席宣判。他说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但从他的表情和大家的反应我能看出是对我有利的判决。然后，他顿了一顿，面向着我，说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词：“congratulation”明白无误，我太有把握了。记得我在医院里生下小女儿时，那个黑人护士把孩子抱来给我看，说的也是这个词（注：恭喜的意思）。

老公突然从背后把我紧紧搂住，在我的脖子腮边一个亲吻。我看到慈祥的老法官、高个子、漂亮的女书记，还有原来一脸严肃的法警都笑了。泪水从我的眼里涌出来，这一切都模糊了……

（责任编辑 吴思）

康有为 与刘海粟

● 钱听涛

谈戊戌维新必论及康、梁，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1987年7月1日，我赴山东即墨参加一个会议。即墨是青岛郊区县，主人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领我到滨海的文登路福山支路5号，康有为故居参观。这是康氏晚年常游之地，并逝世于此。他于1924年购得原德国提督马廐改建成二层楼房，命名为“天游园”，曾高兴地赋诗：“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为荠。庄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我登上二楼，推开窗棂即可见到黄海的浩渺烟波，其旁悬有康氏所书条幅，有逝世前数月全家合影，逝世后棺内所遗随葬品，内室还有其女康同璧及其他家人送来的康氏的衣物书画等。特别令我惊讶的是，主人为我介绍“文革”中的一幕惨剧。康氏1927年3月8日（二月初五）在上海度过70寿辰后，3月21日到青岛，29日出席一位广东同乡的宴会，突感腹痛，抬回寓所后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服药后次日有好转，当夜突然恶化，31日凌晨5时30分猝逝于此楼，年70岁。后即葬于崂山象耳山（一称枣儿山）麓他生前自选墓地。不料37年后，即1966年8月“文革”中竟遭红卫

兵挖墓劈棺，遗骨及随葬品甚至被游街示众，墓碑遗物陈列于“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有一位老人见此十分不忍，偷偷将其遗骨藏匿保存。1984年山东省、青岛市政府为康氏修复故居，重葬遗骨，故居1985年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葬地已修成公路，所以在市东南郊大麦岛村北背山面海的浮山西麓另建新墓园。找到那位好心的老人，起出遗骨及朝珠、玉器等随葬品，于1985年10月27日，举行隆重的迁葬及新墓碑揭幕仪式。我1987年去时未及瞻仰墓园，仅在故居参观。虽然冷清些，但却庄严肃穆，陈列有序。去年有人赴青，我特别嘱咐他到文登路看望故居，不料已显破旧。旁竖公告：“闭馆不开放”，列为危房之类。闻之又使我唏嘘不已。

这次参观时，我进门就见到国画大师刘海粟所题碑刻及所书碑文，才知1984年故居及墓园之恢复、重建与海粟老人建议有关。原来海老生前一直奉康氏为师。海粟老人少康氏38岁，两人又如何相识并成为师生的呢？海老是名画家，1896年生，在他成人时康氏已成为逆时代潮流的著名保皇派、孔教会长。海老是艺术上主张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反封建斗士，两人为何



康有为像

相契？近读袁志煌、陈祖恩编著的《刘海粟年谱》，才解开了这个谜。

1922年3月，刘海粟在上海举办天马会第五届绘画展览会，展出他的油画《北京前门》、《天安门》及《自画像》，康有为前去参观，同时参加展出的画家有吴昌硕、王一亭等。康氏看后留言：“中国画学衰矣。此会开新传旧，将发明新画学，以展布中国文明。”并要求会见年方26岁的刘海粟（康氏时64岁），邀请他次日至康宅吃饭。第二天海粟果然赴约。康氏领他看了所藏古代书画名作，并当面考问一些名画的来龙去脉，海粟应答如流，康氏大喜。谈他的学生林旭8岁能诗，梁启超16岁中举人等，现在就少一个美术学生。海粟愿执弟子礼，并问：“向先生学什么？”康氏答：“画不能教你，可以教你诗、书、文。”以后海粟主要向康氏学书法，每星期五去认真学习。康氏书法在清末民初确实开一代新

风。清代书风，本来惟帖是尊。康有为大声疾呼要“变法变体”，继阮元、包世臣之后，著《广艺舟双楫》，大声疾呼，要把书法与振奋民族精神，兴利除弊，救国救民相联系。他尊碑抑帖，反对馆阁体，确实一新世人耳目。康有为书法为大家推崇，现在在北京龙潭湖袁崇焕祠及密云白龙潭石壁上还可见到康氏苍劲有力的书法石刻。刘海粟从此与康有为来往，1922年7月到杭州时就宿于康氏“一天园”寓所作画，1925年5月在上海办美术展览时也展出康有为书法。1972年刘海粟在写给友人周颖南信中说：“早年获交康南海、梁任公先生。康、梁晚年的政治活动虽然不一定为我所悦服，但他们戊戌变法的精神和治学的态度，是给我以深厚的影响的”。

打倒“四人帮”后，刘海粟于1983年10月去青岛。当他知道康有为故居、墓园遭破坏后，竭力进言修复，1984年8月，他以89岁高龄专诚为此事去青岛，一直住到11月10日才返北京。在此期间，他专诚去浮山察看康有为新墓址，也察看了康有为故居，书写了康有为墓碑及墓志铭，自称“弟子昆陵刘海粟”。墓志铭最后是：“铭曰，公生于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吾铭公兮历沧海。文章功业，彪炳千秋。”1985年12月26日27日，刘海粟以90高龄为康有为迁葬典礼再赴青岛，他在敬献的花篮缎带上写上：“爱国主义家、伟大的思想家康南海老师永垂不朽”，他在仪式上讲话并朗诵《南海康师迁葬感赋》七言律诗两首。

海粟老人是我的同乡先辈，已于1994年8月7日逝世，骨灰安葬在常州刘海粟美术馆的“季芳亭”下，去年6月我去拜谒了。现在追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一段因缘，应该是有意义的吧。

（责任编辑：赵友慈）

明清官吏的“合法伤害权”

——读史随笔之二

● 吴思

—

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有余，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斩敌首级的多少。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叫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注1）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就讲了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故事说，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两个人闹气，巢氏呕气生病死了。邻里几个平日看着他家眼红的好事之徒，便撺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称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陈定一笔。死者的兄弟很乐意跟着敲一笔，便和那几个泼皮讲好了，由他们出面，他躲在暗处作手脚，敲出钱来对半分。

故事说：“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按：即打秋风），未得打发。见这张首状是关着人命，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立时准状，金牌来拿陈定到官，不由分说，监在狱中。”

请注意这里的选择空间：首先，这状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后拿来问讯，对陈定的申辩也是可听可不听的。在这两个具有合法选择空间的关口，那位知县全选择了最具伤害性的一头：“立时准状、不由分说”，而且谁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出了格。笔者是法学方面的外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姑且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却说陈定入了狱，赶紧托人把妻弟请来，让他各方打点。破费了几百两银子，各方都打点到了，特别是县太爷的那位打秋风的老乡满意了，替陈定说了好话，果然就放了陈定。这次释放充

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没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赚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县的老乡，把贿赂他的四十两银子强讨了回来。四十两银子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三四千，多说一两万，显然值得一追。奈何他低估了合法伤害权的伸缩性。知县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出牌重新问案，并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状捎上了陈定的妻弟。该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说，陈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后，“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然后下令挖墓验尸，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同时召集当地各方人等，一边验尸，一边调查了解情况。“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医）报伤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只是不听。”

这案子本来已经算完了，如今，知县要报复，竟可以把两个人重新问成死罪，可见一位知县合法地祸害他人的能力有多么强。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能力十分敬畏，把知县称为“灭门的知县”，又称“破家县令”。最后，这位知县果然叫陈定破了家。丁氏见两个人都活不成，干脆把罪过全揽在自己身上，写了供状，然后在狱中上吊自杀，这才了结了这桩案子。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风险极不对称。武进知县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执法的旗下进行的。只要他发句话，国家的暴力机器就按照他的意愿开动起来，并不用他个人破费一文钱。对付上边的审核，他有法医的证据的支持，应当说风险极小。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与进退自如的知县相反，陈定的小命却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里。他面临着被绞死的风险。即使能侥幸保住性命，坐牢、丧妾、挨板子、耽误生意，这些损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古代刑讯图



二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作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大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

名”。(注2)

合法伤害权在监狱里表现得最为充分，陋规也就特别多。

清朝人方庖蹲过中央级的监狱，并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狱中杂记》。他写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5年)，我在刑部监狱，每天都看见三四个犯人死掉从墙洞里拉出去，一块坐牢的洪洞县的杜县令说，这是病死的。现在天时正，死的还算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死十数人。我问：北京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什么刑部的囚犯还这么多？杜县令回答说：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官员，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胥吏们分这些钱财。

方庖提到的这些榨取钱财的手段，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狱》里有详细的描写。

有个叫黄升的人，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快班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临时拘押牢中，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牢房的尿缸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上。链子收得很紧，让他站又站不直，坐又坐不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史湘泉出来与黄升讲价钱了。

“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史湘泉说：“这屋里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50吊(注：至少相当于人民币3000元)，方许进这屋；再花30吊，去掉链子；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30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5吊。如果天天开，拿100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

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300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

监狱是贪官污吏的镇山之宝，是合法伤害权聚会的大本营。犯人在监狱中病死。或者叫瘦毙，官府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合法伤害权的基础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许多粗黑的枝条，开出许多花样，一概在情理之中。

三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賕”。《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伤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的恶意来挥动，这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碍。“賕”则替人免除了这些麻烦。只要你手中有了权，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甜蜜蜜地腻上你，叫你在绝对不好意思翻脸的情境中缴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们变成一拨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你无须任何恶意，甚至相反，拒绝这种賕，倒需要几分恶意，需要翻脸不认人的勇气和愣劲。因为賕通常是通过亲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门来的。你不仅要翻脸不认谦恭热心的送礼人，还要翻脸不认你的亲戚朋友。

于是，贪赃枉法的成本又进一步降低了，拒绝贿赂的成本则进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碍和礼节的训练在此全面倒戈，反对他们本来应该维护的东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多数人恐怕只有叹一口气，然后甜蜜蜜地，无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怀抱里。又一位清官从此消失。

注1：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十八，杂著。转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关文发等，P251。

注2：转引自吕伯涛、孟向荣：《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

(责任编辑 洛松)

炎黄春秋



曾克林(右二)和苏联军官研究攻打山海关



赵金娥(右一)在加拿大打官司胜诉

明清官吏的「合法伤害权」

一篇《迎春花》 厄运二十年

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世界

听我父亲苏静谈北平和谈

聂绀弩在北大荒

东北易帜始末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